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362 期  
2022 年 10 月 31 日

\*\*\*\*\*

### 目 录

#### 【论 文】

词汇、战争与东亚的国族边界

——“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变迁

黄克武

以国家说民族：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思想的特色

罗志田

正统、道统与华夷之辨

——论南宋的“中国”认同及其历史意义

江 湄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

周竞红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论 文】

# 词汇、战争与东亚的国族边界<sup>1</sup>

——“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变迁

黄克武<sup>2</sup>

**摘要：**“中国本部”一词是从西文的“China Proper”翻译而来，指中国固有的领土，本部之外的地区则是边疆，包括满蒙疆藏等地。此一词汇的讨论要放在中国从华夷秩序到现代国际政治、国家边界的历史过程中来观察。“中国本部”一词原为西方作家为了解清帝国而发明的词汇，用来说明华夷秩序下本土（或所谓十八省）、藩部与四夷；此一西文经翻译传到日本。近代以后，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之际，日人为解释中华帝国疆域并合法化本身疆域扩展而运用此一词语。清末之时此一词语又传入中国，而影响国人对“中国”范围的认定。1930年代“中华民族”的意识在日人侵略下日益增强，开始有学者批评日人的语汇与观点执意凸显中国本部与边疆之分别，又进而引发顾颉刚与费孝通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议。本文描写此一词汇与相关辩论的起源、演变与衰微。

### 一、前言：从华夷秩序到现代国际政治与国家边界

二十世纪上半叶东亚国家疆域的形成与中日两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竞争、角力，以及国人对于何谓“中国”与“中华民族”，其领土范围为何等问题的辩论有关。上述讨论之中，涉及一个当时曾普遍使用、而如今已逐渐为人所淡忘的“中国本部”的概念。本文讨论“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演变与衰微。“中国本部”与“边疆”形成一对相互界定的概念，本部一词的使用亦表示它与本部之外的“边疆”有所区隔；本部意指中国人固有的领土（或称“中土”、“汉地”，或广义的“中原”等），而边疆地区的“四夷”则有时加入中国、有时脱离中国。此一语汇内涵的变化涉及中国（包括历史上和现在）含括的范围为何？族群与地理的关系、本部之外的满蒙疆藏等地或其他地方是否属于中国？以及更根本的议题如民族是什么？族群、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为何？



清代的“本部”地区

<sup>1</sup> 本文选自李晓东、李正吉主编《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秀威出版 2022 年。  
[https://mp.weixin.qq.com/s/\\_QY-0aa0d8aAmLalhHx16g](https://mp.weixin.qq.com/s/_QY-0aa0d8aAmLalhHx16g) (2022-7-5)

<sup>2</sup> 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本部一词是从西文的 *China Proper*（包括相同意义的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等）而来。此一词汇问题的讨论要放在传统华夷秩序到现代国际政治、国家边界的过程所引发的争议来观察。中国本部与边疆（或属领）概念的出现本来是西方学者为了解中国历史、地理与政治统治而创造的词汇，是配合中国传统华夷秩序下“内地—本土”与藩部、四夷之地域观与本身的族性地理观（*ethnic geography*）而发明的一个观念；此一西文语汇又透过翻译传到日本，再传到中国。近代以后在现代国家形成之际，日本人为解释中华帝国疆域并合法化本身的疆域扩展，而将西方词语 *China Proper* 翻译为“支那本部”或“本部支那”。

此一词汇原为描述性，随后与日本具有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满蒙不属于中国论”、“元清非中国论”等观点相结合，用来解释东亚的地缘政治。此一词语在清末被翻译入中文之后，又影响到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与改良派人士对“中国”范围的认定，前者秉持汉人为中心的种族革命，国家领域较狭隘，而后者则主张族群融合，领域较宽广。

民国以后此一词汇在中文世界变得十分普遍。1930年代“中华民族”的意识在日人侵略下日益增强，开始有学者批评清末“种族革命”与民初“五族共和”的民族观，亦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的一些御用学者的观点，执意打破中国本部与边疆之分野，此一观点又在国内引发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议。“中国本部”与“边疆”在近代史上的演变，一方面反映知识概念的跨国流转，另一方面可以透露中日国族观念的变迁与国家疆域之角力，以及国内族群与疆域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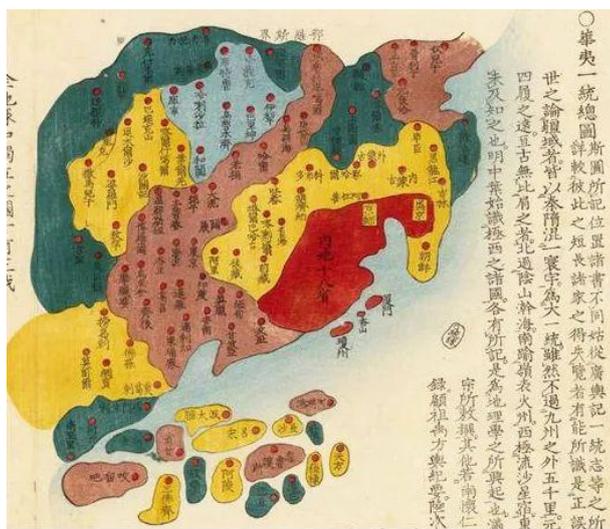
有关此一议题较重要的二手研究有四川大学陈波教授所发表的《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2016）、《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2017）两文。<sup>[1]</sup>这两篇文章修正、补充了过去对于此一概念的认识。<sup>[2]</sup>作者的主要贡献是：第一、澄清西文文献之中词汇渊源，认为“‘中国本部’是后世对西班牙文 *la propia China*、拉丁文 *Sinae Propriae* 和英文 *China Proper* 等词汇的中文翻译。它们于16至18世纪在欧洲起源，并逐步得以塑造、成型，其土壤是欧洲的血亲专属观和族性地理观”。第二、说明日本明治时期“支那本部”一词乃翻译自西文，以及该词出现之后在日本学术界、思想界的变化。作者认为“至明治维新，受西方文献的影响，始有支那本部等译法，日本学者逐渐展布相关概念和分类体系，对以前所持的华夷秩序观进行转换，继续建构日本中心主义的同时，对中国诸部重新分类，并逐渐突出‘支那本部’即为‘支那’的观念。这为日本扩张主义者利用，成为其分裂中国的指导观念”。第三、作者也讨论到中国学者、政治家使用本部观念的情况；他指出“1901年梁启超将日文的‘支那本部’改为‘中国本部’后，1910年代至1930年代‘中国本部’概念在中国使用得较为普遍”。<sup>[3]</sup>至1939年顾颉刚撰文强调此一观念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之关连，而主张废弃此一用语。第四、作者批评部分西方汉学家（新清史支持者有相同的想法）对此概念诠释的谬误。例如周锡瑞“论证清是如何在20世纪初变成 *China*；言下之意，清不是 *China*……他把大清视为‘帝国’因此有本部之说”。<sup>[4]</sup>

陈波的分析增加了我们对“中国本部”词汇的历史的认识，他对新清史的批评也符合海峡两岸学界的主流论述。然而有关中国本部的讨论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分析之处，尤其是该词汇进入中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96年《时务报》古城贞吉（1866-1949）所翻译的《中国边事论》，再者，中国本部一词引发中国知识界辩论的思想史意涵亦可再做挖掘，本文拟在这些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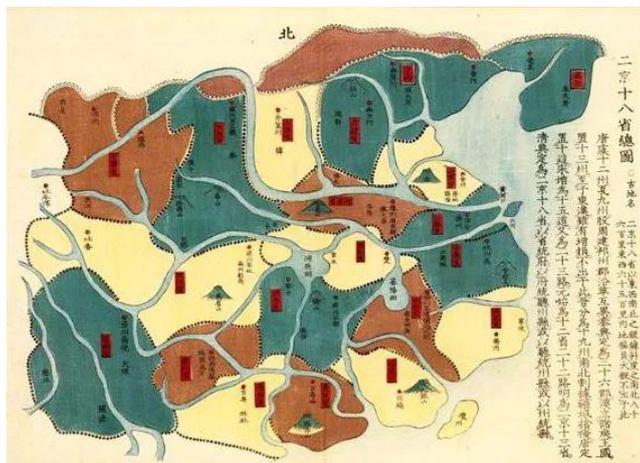
## 二、从几张地图说起

有关近代东亚地理观念的转变与中国本部（日人称为“支那本部”）观念的出现可以从几张地图说起。第一个史料是为《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图》，此套地图集由日人东条文左卫门（1795-1878，号琴台）于1850年（日本嘉永3年、清道光30年）所绘制。<sup>[5]</sup>该书中的两幅图

可以反映 1850 年时一部分日本人的世界观与中国在其中的角色。第一张为“华夷一统图”，第二张为“二京十八省总图”。这两幅图大致展现了 19 世纪中叶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而所谓“皇国汉土（西洋人呼支那）”的地方主要是指“二京十八省”“内地十八省”（参见下图）。“二京十八省总图”的说明部分表示“唐虞十二州，夏九州岛岛……元始为十二省，二十二路。明为二京十三省。清兴定为二京十八省，以省统府，以府统州县”，其中二京为京师和盛京（附吉林、黑龙江），而福建省则包括了台湾府（图中标为“厦门”）。<sup>[6]</sup>作者也了解按照《清会典》，清朝除了内地二京十八省之外还有蒙古、喀尔喀、青海、西藏等夷地，以及附属诸国，但是他认为这些地方对于日人“皆无裨益”，所以该书就不收录了。由此可见此书编者认为清朝主要的领土是“内地十八省”“二京十八省”。此亦可见 1850 年之时“本部”的观念尚未出现。有趣的是此图之中日本不在华夷秩序之内，与《华夷变态》《中朝事实》等书日本自比华夏，而视清为蛮夷之观点不同。<sup>[7]</sup>



《华夷一统总图》



东条文左卫门绘，《清二京十八省輿地全图》，1850

第二个地图史料是 1899 年孙中山所绘制之《支那现势地图》。该图绘于 1899 年底之前，1900 年 2 月在香港，7 月在东京出版，由主张亚细亚主义的东邦协会发行。<sup>[8]</sup>此图为套色印刷，为 73 厘米×73 厘米正方形，比例为 1: 2,950,000。在绘制《支那现势地图》的过程中，孙中山不仅考察了清康熙时期来华天主教士所绘制的《十八省地图》，同时参考了俄、德、英、法等国所

绘制中国南北各省地图和天文图、地质图、航海图等专门地图，以及在日本书刊中的统计资料。<sup>[9]</sup>孙中山在《手制支那现势地图识言》中表示：

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舍科第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者矣。然实学之要，首在通晓舆图，尤首在通晓本国之舆图。……中国舆图以俄人所测绘者为精审。盖俄人早具萧何之智，久已视此中华土地为彼囊中之物矣。故其考察支那之山川、险要、城郭、人民，较之他国舆地家尤为留意。近年俄京刊有中国东北七省图及中国十八省图，较之以前所有者，精粗悬殊矣。德国烈支多芬所测绘之北省地文、地质图各十二幅，甚为精细。<sup>[10]</sup>法国殖民局本年所刊之南省图，亦属佳制。此图从俄、德、法三图及英人海图辑绘而成，惟篇幅所限，仅能撮取大要，精详之作尚待分图。至于道路、铁路、江河、航路、山原高低，则从最近游历家所测绘各地专图加入。其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惊心云。昔人诗曰：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掷笔不禁叹息久之。时在己亥冬节 孙文逸仙识。<sup>[11]</sup>

该图下方附有“支那国势一斑”的一个表，上面列有中国面积及人口、十八省的范围、二十四个省城（十八省之外还包括顺天府、盛京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西藏、新疆省，应为后版所补充）、外国互市场、重要物产等。其中面积及人口的分类为“支那本部”与“属领”，后者包括满州、蒙古、西藏与土耳其斯坦。由此可见清末之时，孙中山所认识的中国包括“支那本部”（亦称“中国本部”）与四个属领之地，合而为中国。此图可视为清末革命者如何以现代国家边界之理念来绘制中华帝国之“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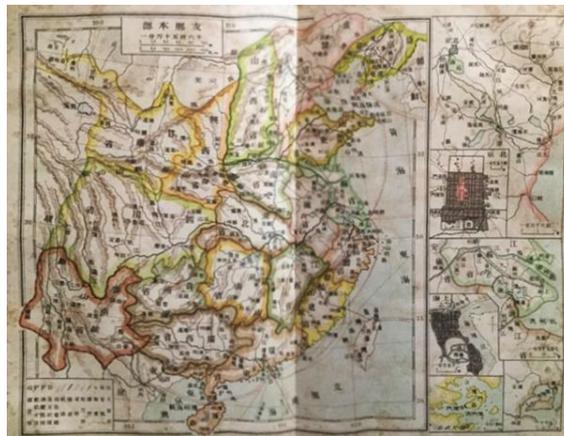


孙中山绘制《支那现势地图》1900年7月14日发行

《支那现势地图》所附“支那国势一斑”

从 1850 年东条文左卫门所绘制的地图到 1899 年孙中山的地图可以窥知“本部”观念源于十九世纪的下半叶。20 世纪初“中国本部”一语进入中文世界后迅速传播，根据顾颉刚的说法，至 1930 年代“中国本部……这个名词可以说没有一本地理教科书里没有，已经用得烂熟，大家觉得是天经地义了”，<sup>[12]</sup> 而中国本部之外即是边疆。中国本部一词又与清末民初“五大民族”、“五族共和”的说法结合，“使得中国人……以为本部中住的人民是主要的一部分，本部以外又有若干部分的人民，他们就联想即于满、蒙、回、藏，以为这四个较大的民族占有了从东北到西南的边隅，此外再有若干小民族分布在几个大民族的境内，而五大民族之说以起”。<sup>[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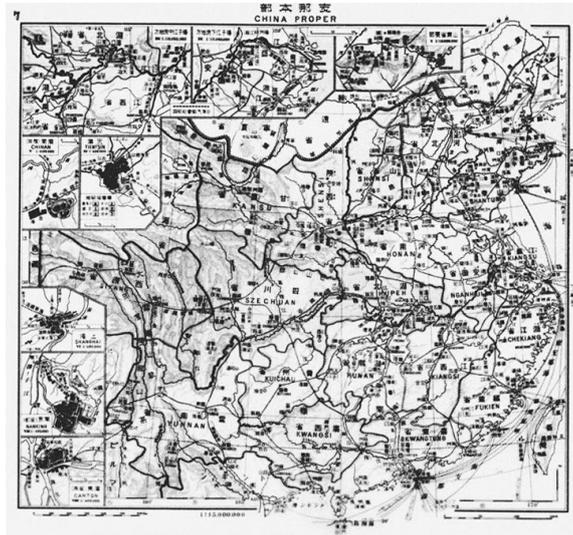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之时以“中国本部”之观念来表示中国之领土在日本人所绘制的地图之中也很流行。1908 年富山房《国民百科辞典》中配有“支那本部”彩色地图。<sup>[14]</sup> 1930 年代日本的地理书之中有许多幅“支那本部”的地图。如 1930 年《开成馆模范世界地图》之中虽有“中华民国”的地图，但又附了几张“支那本部”的地图，如铁道图、产业图等，而满蒙也单独绘制了一张地图。<sup>[15]</sup>



富山房“支那本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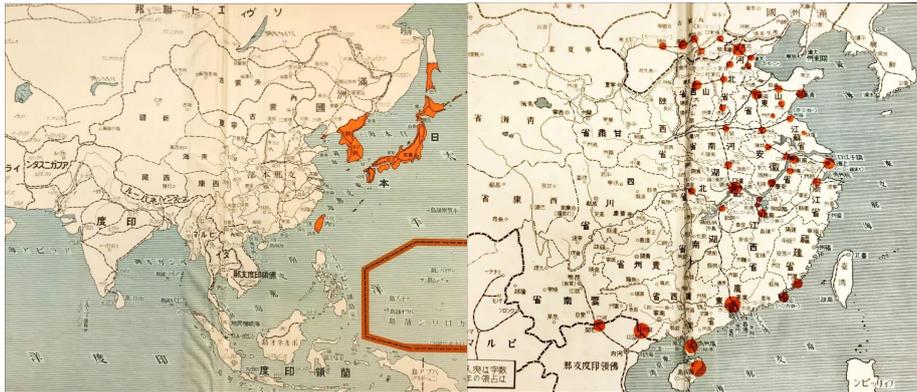


开成馆“中华民国”图



开成馆“支那本部”图

至 1940 年代日本侵华时期所绘制的地图则更强烈地表现出帝国主义侵华之意图。如名取洋之助（1910~1962，著名摄影家，留学德国，为国家主义者）1940 年所出版的《征服华中》（『中支を征く』）的摄影集之中有 404 张照片，24 张地图，其中“东亚要图”之中，东三省被标为“满洲国”；台湾、大连、朝鲜、库页岛南部与日本本土，则被标成同一种颜色（参见下图）；蒙古、西藏、新疆等没有被纳入中国的版图。“支那全图”之中，中国只包括“支那本部”。<sup>[16]</sup>



《征服华中》一书中的《东亚要图》《支那全图》

除了日本人之外，西方人也采用此一观念。1944年美军战时宣传片《我们为何而战：中国战事》中的地图，将中华民国分为中国本部、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sup>[17]</sup>



《我们为何而战》第六集《中国战事》中所示的地图

当时的联合国所认识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包括中国本土（China Proper）、满洲（Manchuria）、蒙古（Mongolia）、新疆（Sinliang）与西藏（Tibet）。《我们为何而战》是美国政府于二战间制作，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拍摄的系列纪录片。开始时是为了向美军讲述美国为何参战，后来向美国公众公开，以求全体国民支持联邦政府共同作战。有《战争前奏曲》（Prelude to War, 1942）《纳粹的进攻》（Nazis Strike, 1942）《瓜分与侵略》（Divide and Conquer, 1943）《英国战事》（The Battle of Britain, 1943）《俄国战事》（The Battle of Russia, 1943）《中国战事》（The Battle of China, 1944）《战争迫近美国》（War Comes to America, 1945）《认识你的敌人日本》（Know Your Enemy: Japan, 1945）八部影片组成。其中，最后一部中因将裕仁天皇描写成了战争罪犯，与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相悖，故未能上映。第六部《中国战事》，当时导演是以中国的“盟友”的同盟国立场进行编辑，全片贯穿着《义勇军进行曲》的主题音乐。介绍了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和善的大国，以及日本为何要通过征服中国来称霸世界。

本部一词究竟从何时开始使用，又如何传入中国，为何在 20 世纪学者间针对“中国本部”一主题产生争辩？此一争论对东亚各国疆域形成有何影响？下文将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 三、中国本部观念的溯源：从行省制度到中国本部观念的引介

中国本部观念在 20 世纪上半叶于中文世界的流行涉及经由跨语际翻译所产生复杂、多线的观念的旅行。以下分为数点来做说明。

第一：中国传统没有“本部”的观念，此一词汇源自近代日语。1952年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指出“行省”原指流动的中央政府，故行省之称呼有所不妥，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而“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本部与非本部之别。他说“秦始皇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敌人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sup>[18]</sup>这样的观念应该是受到顾颉刚的影响。从语言学上的演变来看也可以说明“本部”一词乃近代日本的和制汉语，并非中国传统语汇。陈力卫对于“本-支”概念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中国传统虽然也有“本末”、“源流”、“支干”的说法，但“本支”的造语是在近代日文在“对义”、“区隔”的理念下追求概念的细分化，而使这些对应和区隔变得更加突出，以此来适应近代化、专业化的需要。“本部-支部”、“本线-支线”、“本队-支队”、“本厅-支厅”均为日本近代出现的对义语，这些语汇又传入中国。相对来说，中文的传统语汇中“本”与“末”相对，“支”与“干”相对，并不将本与支合用；至于在现代汉语之中，只要是部分的范畴即能单独成立，不严格地要求以二元对应来进行区隔。如相对日语中的“大学本部”和“大学支部”的严格对应，中文则使用“北大-北大分部”、“委员会-支委会”等。陈力卫又以“中国本部”为例，指出“以前在日本将汉族十八省作为中国的主要部分，结果出现‘中国本部’的用法。出于上述日语的对应区隔的考虑，本部的观念需有对应性的‘支部’。在此理解之下，日人在有一些时期有意无意地将包含蒙古、满州在内，一些中国在法的支配上很难定位的地方称为‘支部’，从而弱化了中国对其之统治。这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有所冲突”。<sup>[19]</sup>上述历史学家与语言学家的论断足以显示“本部”一词汇与近代日语之关系。

第二：中国传统与本部观念相关的词汇是省或行省，本部观念的形成受到传统中国“行省”观念之影响。从元代开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钱穆认为其内在精神是“军事控制”、“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sup>[20]</sup>至明代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而清代沿袭元明制度，地方行政单位称为“省”，有“两京十三省”的说法。省的数目历代有所增加，从12、13、15省到清代有17省、18省。1860年代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之中首度将China Proper翻译为“十八省”，可见其对应关系。<sup>[21]</sup>1884年井上哲次郎的《订增英华字典》一方面继承此一译法，将China Proper翻译为“十八省”，<sup>[22]</sup>另一方面他又承继1875年邝其照《字典集成》将China Proper翻译为“正中国”，邝其照与井上的译句如下：“the Chinese Empire consists of China Proper Mongolia, Manchuria and Tibet 大清国天下合正中国蒙古满洲并西藏而成”。<sup>[23]</sup>不过“正中国”的译法后来颇为罕见，1899年邝其照《英华字典集成》又略做修改，删除了“正”字：“the Chinese Empire consists of China Proper Mongolia, Manchuria and Tibet 大清国天下统中国蒙古满洲及西藏而成”，颜惠庆亦跟着此一译句，直接将此句中的China Proper翻译为“中国”。<sup>[24]</sup>

在清代文献中十八省之外则有“藩部”与“四夷”，此即上述华夷秩序的天下观。在清代文献之中与“十七省”“十八省”相结合的词条有好几种，如“内地十七省”“内地十八省”“中土十八省”“汉地十八省”等。从“汉地十八省”的用法来看，十八省的观念与汉人的居住地亦产生关连，此一意涵配合西方的族性地理观。

第三：西文中的China Proper（中国本土）观念，此即陈波所谓16至18世纪之中“西班牙文la propia China、拉丁文Sinæ Propriæ和英文China Proper等”语汇在西文文献中的出现。此一词汇的一般理解是：是西方世界对历史上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由于汉族强势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此区域多指长城以南，并不包括由满洲族统治之清朝所在的满洲，以及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域。<sup>[25]</sup>

就文献的起源而言，陈波所提到最早的例子是 1585 年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的《大中华王国最着礼俗风物史记》（*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Rome, 1585）一书之中“葡萄牙人的城市澳门是与广州毗邻，而广州则是‘中国本部’的城市”。<sup>[26]</sup> 此时观念的发展尚不成熟，该书也未具体说明“中国本部”的含意，约略指“中国版图之内”，而这一王国“分为十五省”。<sup>[27]</sup> 至于该词汇在英文文献的起源，根据包括约 20 万本书的 ECCO（*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Gale Cengage learning 公司发行），最早提到“China Proper”的书是 1762 年是 John Mair 著 *A Brief Survey of the Terraqueous Globe*（全世界的简略探索），<sup>[28]</sup> 书中指出中国本部指“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页 164）。其次是 1768-69 年 Tobias George Smollett, *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Nations*（各国现况）。<sup>[29]</sup> 而最早较清楚界定“China Proper”的书是 1795 年英国人威廉·温特博特姆（William Winterbotham, 1763~1829）所撰写的 *An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有关中华帝国的历史、地理与哲学的观点）。<sup>[30]</sup> 在第二章“中华帝国之概述”，他说：“为试图对这个庞大帝国做一概括描述，将进行下列安排：一、“中国本部”；二、“中属鞑靼”；<sup>[31]</sup> 三、“中国的册封属国”（见页 35）。作者将明朝十五省的疆域归入中国本部，由血缘群体汉民族居住；而西伯利亚、满洲（东北）、蒙古、东鞑靼（含今日之新疆、阿富汗、北巴基斯坦等）等地归入中属鞑靼。中国所册封的属国（朝贡国）则包括西藏、朝鲜、琉球、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吕宋（菲律宾）等。此一用法大约是 18 至 19 世纪英文 China Proper 的意涵，亦即指称明朝 15 省（即两京十三布政司）、清朝 17、18 省的范围。

第四：19 世纪末约七十年代：日本以“支那本部”翻译西方 China Proper 观念来描述中华帝国。在这方面最早的例子可能是 1870 年内田正雄（1839~1876）所编译的《舆地志略》一书（初版），作者指出支那是将“本部”与塞外的许多地方合为其版图，而“支那本部”是指长城以内，“原来之汉土，是唐虞以降历代邦国之隆替、英雄之兴亡皆在此之内”。<sup>[32]</sup> 其次，根据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数字数据库可以找到德国学者グリウリンヘルド 著、菅野虎太译述的《万国地志略》（1874 年），所谓“支那领”的范围包括“支那本部、西藏、支那鞑靼、天山北路、满洲、蒙古、朝鲜、琼州岛、台湾岛”。<sup>[33]</sup> 由此可见此时的译书中支那包含了“支那本部”之外的许多地方，换言之，后来日本人利用“支那本部”一语来“弱化”中国边疆属于中国的领域之作法在 1870 年代初期之时尚未出现。



《万国地志略》（1874）封面与其书中“支那领”之地图

第二个例子是参谋本部管西局编《支那地志》（1887）中“本部支那”一词。在下村修介所写的凡例之中说明：“支那全部之区分是由欧美人所说而来，但有些小小的出入。今此书对支那行政之区划本此而定，分为本部支那、满洲、蒙古、伊犁、西藏等五个部分。以十八省为本部支那、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满洲、内外蒙古青海及内属游牧部为蒙古、以天山南北路为伊犁、以前后藏为西藏”（参见附图）。<sup>[34]</sup>后来所盛行的包括中国本部、满、蒙、新疆、西藏的“五分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此书。上述孙中山于1899年所绘地图中的地理观念与此有关，他可能曾参考这一类书籍。

地名	地積	人口
本部支那	三七四、一一五	三七二六二、〇〇〇
满洲	六三、六六二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蒙古	二四八、四四七	四、一五〇、〇〇〇
伊犁	六六、四七六	一、四四〇、〇〇〇
西藏	一〇〇、七二二	六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八五三、四二二	三九六、二二〇、〇〇〇

《支那地志》之统计表

在支那本部（与本部支那）一词出现之后，日本学者有多种不同区分中国的方式。诚如陈波所述“对中国的各种区分法，其核心是要调整所谓本部和其他诸部的关系”，而开始引进“族性的地域观”，而出现“支那本部即汉人本部”的想法。<sup>[35]</sup>此一“族性地理学分类体系”进一步的与“日本扩张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结合，强调本部之外模糊地带并非中国固有疆域，“元清非中国论”、“满蒙非中国论”与此一地域观念有密切的关系。<sup>[36]</sup>

第五：日本的“支那本部”一词传入中国而有“中国本部”的词汇在中文世界的诞生。最早是《时务报》、《知新报》翻译日文报刊，引入中文世界。首开先河者为1896年《中国边事论》。该文的译者古城贞吉将日文中“支那”改为“中国”而有“中国本部”一词的出现。然而同为维新派报刊的《知新报》、《清议报》则直接沿用“支那本部”一词。<sup>[37]</sup>清末民初时这两个词汇在报刊上同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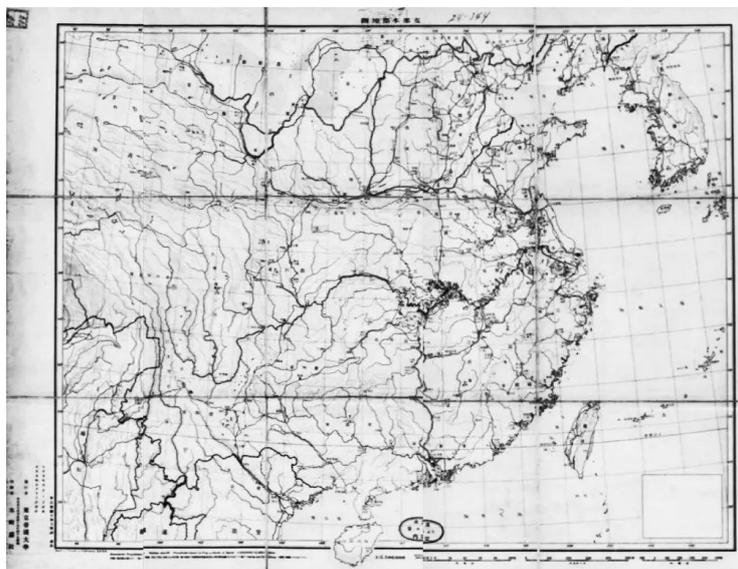
古城贞吉的翻译文章是“东文报译”栏目中，译自“东邦学会录”的《中国边事论》一文。此文分四期连载于梁启超（1873-1929）主编的《时务报》，第12、15、16、18期（1896-1897）之上。原文为《东邦协会会报》第27、28两期（1896）所刊的『清国边备に対する露国の攻守论』（《俄国对于清朝边备的攻守论》）一文。<sup>[38]</sup>

在此文之首有古城贞吉的案语：

俄国陆军少将辅加脱氏，驻燕京多年，南船北马，足迹遍四百余州，即于中国军事留心考察，着书极富，《观论中国》一编，已见其用心矣。不识华人读之，如何感慨乎？或等云烟过眼乎？亦大为寒心乎？噫！今日中俄保护提携，恶知异日不作吴越之观哉。<sup>[39]</sup>

文中有关“中国本部”（原文为“支那本部”）的部分是在《时务报》第15册，“盖新疆地方，距中国本部离隔颇远，悬军万里，其不利可知……蒙古一带之地，荒野苍茫，介于我西伯

利亚与中国本部之间，土地不毛、人烟稀薄，苟从军政上起见，此处显为要地矣”。<sup>[40]</sup>文中其他几处亦有“中国本部”一词。<sup>[41]</sup>



《支那本部地图》（东京帝国大学，1920.3）

上文中的俄国陆军少将铺加脱氏是 D.V.Putjata（1855~1915），俄文名字是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Путята, 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他参加了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战争、俄土战争（1877-1878），1886-1892 年出任驻华武官，1896 担任韩国政府的军事顾问，1898-1902 担任亚洲部门的主管。上文所说的《观论中国》一书则是 1895 年出版的 *Orepku Kutauckou Muzhu Ocherki Kitaiskoi Zhizni*（《中国生活的概览》）。<sup>[42]</sup>

东邦协会是日本于 1890 年由热心南洋殖民的福本诚（号日南，1857~1921）、探险中国内地的小泽豁郎（1858~1901），和从事中国贸易的白井新太郎（1862~1932）等三人发起。该会发行《东邦协会会报》，其创办旨趣为：“寰宇上国之所以建立岂偶然哉……当此时际，以东洋先进自任之日本帝国，尤非详审近邻诸邦之状况，对外部扩张实力，藉以讲求与泰西各国在东洋保持均衡之计不可”。<sup>[43]</sup>上述孙中山所绘制的地图亦出于此一目的而由该协会出版。由此可见《中国边事论》一文是翻译自东邦协会出版的《东邦协会会报》之中一篇翻译自铺加脱俄文书籍的日文作品。换言之，俄日中的连环翻译造成此一词汇在中文世界的诞生。

1908 年在颜惠庆所编的《英华大辞典》之中 proper 一词之下有“China proper, 中国十八省, 中国本部”的解释，两者对译关系正式出现。<sup>[44]</sup>1916 年赫美玲所编的《官话》也采用此一翻译，将 China proper 译为“中国十八省, 中国本部”。<sup>[45]</sup>由此可以确认“中国本部”一词是从 1896 年出现在中文世界，至二十世纪初年为辞典收录，并开始流行。

第六：中国本部观念之流衍。在中国本部一词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地报刊上就出现“本部十八省”的说法，将“本部十八省”相结合。1901 年《清议报》第 75 册中《支那保全及满洲处置》提到“本部十八省、东三省（满洲）、蒙古、西藏、天山南北二路、东土耳其斯坦，共称为大清帝国之版图”；<sup>[46]</sup>1904 年《江苏》第 8 期《英德于扬子江之竞争》中有所谓“中国本部十八省，沿海者七省，沿江者七省……”。<sup>[47]</sup>1907 年吕志伊在《云南杂志》所撰写的《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提到“我国人民无共同心，无团结力。本部十八省则分如十八小国”。<sup>[48]</sup>

第七：种族革命与本部词汇之结合。晚清时太平天国的文献、革命书刊，均采取反满之种族革命之观点，至民初的“十八星旗”具体呈现此一种族与地域结合在一起的观念，亦即主张建立一个汉人为主体的国家，而其疆域与十八省的范畴相符合（亦即主张中华民国领土为内地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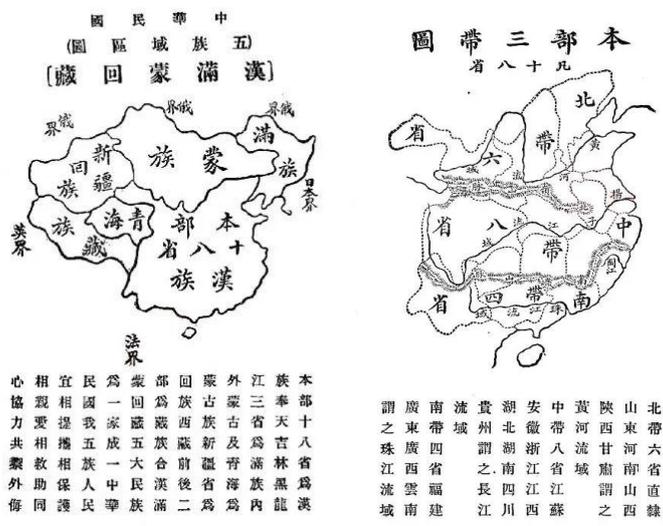
省)。种族革命之起源可以追溯至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口号之一即是希望重建“十八省江山”“英雄十八省”。<sup>[49]</sup>晚清的革命志士继承此一想法，而将目标调整为“本部十八省”。兹举邹容的《革命军》与陈天华的《狮子吼》为例。邹容强调汉族据有“中国本部”而逐渐次第繁殖于四方，“汉族：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据中国本部，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自古司东洋文化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朝鲜、日本，亦为我汉族所蕃殖”。陈天华的《狮子吼》第2回，“话说天下五个大洲，第一个大洲就是亚细亚。亚细亚大小数十国，第一个大国就是中华。本部一十八省，人口四万万，方里一千五百余万。连属地算之，有四千余万，居世界陆地十五分之一”。<sup>[50]</sup>章炳麟的《中华民国解》一文，虽没有用“本部”的词汇，然而其想法亦很类似，较为独特之处是章氏坚持反满而主张中国领土不止为十八省，而应恢复至汉朝之疆域，并认为边疆地区可“任其去来也”：“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sup>[51]</sup>

章太炎1900年后转向“排满”，被梁启超说是“排满信念日烈”，“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1912年民国肇建之后，他对革命党“排满革命”造成非汉族群聚居边疆社会与共和国的疏离有所反思，面对主权国家的领土现实，关注满、蒙、回、藏等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危机，力主国家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夷夏尽有”的国家建构模式；亲履边疆故土，对边疆治理提出具体方案。九一八事变之后，章太炎联手马相伯发布宣言，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两个角度，确证东三省属于中国领土。也即，革命者章太炎在革命成功之后回归到了其革命的对象清王朝在面对“革命”时所主张的国家统一立场上。

在十八行省建立汉族国家的想法也受到欧洲与日本从十九世纪开始所谓“民族建国主义”理论或“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即认为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里，惟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必然分崩离析。《江苏》上《新政府之建设》（1903年）一文主张：

试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来此等惊天动地之大风潮，龙拏虎掷之大活剧，连篇累牍，纷陈眼帘，何一非民族主义所激荡所演出者耶！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消磨。<sup>[52]</sup>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十八星旗”（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时的旗帜）即具体呈献此一汉人建国的理念。<sup>[53]</sup>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为促成团结改而强调“五族共和”。民国初年的一本军人教育的宣传图册即表达此一“五族共和”的想法，并将地域与种族做一清楚的划分，其中“本部十八省”为“汉族”所居之地（分为北中南三带），此外满蒙回藏各据一地。“五族共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汉族中心理念，主张以汉人中心追求五族平等。该书之中的作者表示清朝时“外藩地方”，“毫无权利享的，一种困苦贫穷的形状，实在是一言难尽”，“现在民国成立，视满蒙回藏的人，如亲兄弟一般，必要设法使他们同汉人一律受利益，享幸福，不许外人侵占半寸的地皮”。<sup>[54]</sup>



《军中白话宣讲书》，第4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卷首附图。

第八：从1912至1930年末期，中文之中广泛地采用“中国本部”“我国本部”的用法，而并不关心背后的族群政治的意涵。兹举数例，如1924年蒋介石致廖仲恺函，指出：“俄共殊无诚意，其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认为可与吾党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则在使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亦未始无染指之意也”。<sup>[55]</sup>又如罗从豫的《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与中国本部贸易之回顾》，“昔日我国本部对东三省贸易，素视为国内贸易者，今已不得不划为国外贸易之范围；本部大量出产品，昔日源源运入东省者，今已不得不受关税运输等种种之限制”。<sup>[56]</sup>这一篇显然为了因应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之后的处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作者将中国本部视为中性的地理名词，并不觉得“中国本部”一词的使用是有问题的。

#### 四、顾颉刚与费孝通对“本部”“边疆”等词的争辩

中国“本部”一词进入中文之后，与“边疆”（又有“边疆民族”的说法）相对应，成为流行词语。首揭旗帜反对中国“本部”“边疆”等词的学者是顾颉刚。顾颉刚在19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强调中华民族应团结一致以抵抗外侮。1937年1月10日在《申报》“星期论坛”上顾颉刚曾写《中华民族的团结》，主张“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sup>[57]</sup>1939年2月13日他又写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登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开宗明义即说“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顾颉刚“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这三种文化，汉文化是自创的，藏文化是取于印度的，回文化是取于阿剌伯的，一个中国人可以随着他的信仰而加入一个文化集团，不受限制”。<sup>[58]</sup>该文刊出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sup>[59]</sup>一直到1947年在南京的《西北通讯》创刊时又转载了一次，编者表示“顾先生此文，引证详博，议论正大，为促进民族团结最为有力之作。其热情洋溢，感人尤深”。<sup>[60]</sup>

顾颉刚力主“中华民族是一个”，而批判“中国本部”一词，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用来欺骗国人的宣传手法。他表示早在1934年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之时即注意到此一议题。在《发刊词》中他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即不发

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该刊的目的之一即对此谬论从学理上加以驳斥。<sup>[61]</sup>1938年10月18日的一场演讲中，顾颉刚又提及日人为了分化中华民族，巧立“中国本部”一词，又藉“满蒙非中国领土论”来“实行强占东北”：

日本人在我国地理上，公然给我们创出“中国本部”的名称来。我们在古史上从未见过“本部”这一名词，秦汉时我国的版图最大，南到安南，东到朝鲜；至于元时之疆域，横跨欧亚两洲，虽在中央政府有十一个行中书省，但并无本部的名称。这完全是日本人利用这些名词来分化我们的毒策。<sup>[62]</sup>

此后他又撰写《“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等文，这两篇文章是他对“本部”问题的系统表述，也配合他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sup>[63]</sup>

1938年12月原在天津的《益世报》因战火的关系迁至昆明。12月3日顾颉刚至环城东路的天主堂和于斌主教与牛若望神父见面“谈国事及周刊事”，双方决定在《益世报》上出版《边疆周刊》的专栏；12月9日方豪与牛若望又访顾“为办《边疆周刊》事”；18日顾颉刚在日记上写到：“到《益世报》馆访牛若望神父”。<sup>[64]</sup>19日《边疆周刊》发刊，顾颉刚撰写了《昆明〈边疆周刊〉发刊词》：

在九一八以前，日本人早在地图上把满蒙和他们本国染成一色，然而我国人视而不见……我们办这刊物，要使一般人对自己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边疆史……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直到中华民国的全部疆土笼罩在一个政权之下，边疆也成了中原而后歌者。<sup>[65]</sup>

由此可见顾颉刚核心旨趣是避免分裂国土，希望未来能将“边疆”都变为中原，使全国团结成一个完整的国家。12月20至21日，顾在日记又写到“到校，作〈中国本部名词亟应废弃〉论，计三千六百字，即抄清，未论”；“归，续抄论文毕”。<sup>[66]</sup>后来该文刊于1939年1月1日《益世报》“星期评论”之上。1939年1月27日，《中央日报》转载了他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1939年2月至3月又有许多报刊，如绍兴的《前线》旬刊与宁波的《复兴旬刊》转载此文。<sup>[67]</sup>



《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益世报》1939年2月13日“边疆周刊”

文中提出“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本为梁启超面对西方民族主义提出的“民族”

(nation)这一现代概念提出的“反题”与“超克”，是一个超越单一民族(nation)的存在，而顾颉刚此处俨然有将“中华民族”“nation化”的倾向。或许，将nation翻译为“民族”，而将清帝国奠定的统一版图内的多族群的超nation的联合体也定名为“民族”本身就造成了汉语中“民族”这一概念的模糊与歧义。

值得反思的是，什么是“民族国家”？世界上“民族国家”的塑造其实普遍经历了非常残酷的历史代价，中国为此准备好了吗？“民族国家”(nation)这一现代性概念，是否是现代性的必然选择？传统的帝国或多民族国家是否即是现代性的对立？美、英不也正是多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帝国”(Empire)吗，它们是所谓“民族国家”吗？为反对殖民主义而刻意将“中华民族”“nation化”，也即将中国“民族国家化”，难道不正是坠入了西学东渐下的“问题误置”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问题殖民”中？

他认为此一词汇在中国的使用源自约40年前(1898~1900前后)，来自日本教科书，是日本人为了侵略中国的“恶意宣传”，这一点是符合史实的；但是他说“西洋人承受了日本杜撰的名词，亦译‘中国本部’为China Proper”此点则与史实不符，实际上该词是日本翻译西文而来：

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个地方叫做“本部”，中国的各个地理学家也不曾设想把某一部分国土定为“本部”，在四十年前我们自己的地理书里更不曾见过这本部的称谓。<sup>[68]</sup>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究竟创始于谁人的笔下？此间书籍缺少，无从稽考，只知道我们的地理教科书是译自日本的地理教科书，而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西洋人承受了日本杜造的名词，亦译“中国本部”为“China Proper”，这或者是不谙悉远东的历史而有此误会，或者也含些侵略的心思而有意替他们推波助澜。<sup>[69]</sup>

顾颉刚指出此词流行之后，许多人认为中国只有中国本部，许多边疆地方渐渐不成为中国领土。这是日本人“伪造历史或曲解历史来作窃夺我们土地的凭证”。顾氏特别举出日本京都大学矢野仁一(1872~1970)教授的“满蒙非中国论”，此一观点又影响到日本的政治人物如首相田中义一(1864~1929)。田中在向天皇的奏章中提出“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亦非中国的特殊区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田中的奏章上又说，‘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中国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sup>[70]</sup>顾颉刚认为“自日本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sup>[71]</sup>

顾颉刚认为“本部”一词对中国的影响则是：

他们的宣传达到中国之后，我们就上了当了，大家感觉得“本部”的地方是我国本有的，是痛痒相关的；除了“本部”之外原是哈希上去的，有之固然足喜，无之亦不足惜，“任他去罢！”于是由得他们一步步地侵蚀，而我们的抵抗心也就减低了许多了。<sup>[72]</sup>

一说到“本部”，就使人立刻感到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不是中国的领土了，于是中国不妨放弃，帝国主义者便好放手侵略了。这不是利用了刺戟听者的情感反应的方法而攫取我们的土地和人民吗？<sup>[73]</sup>

顾颉刚不但批评“中国本部”的概念，对“边疆”一词亦表疑虑。这很可能也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傅斯年对由顾颉刚主编的《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使用“边疆”为刊名颇有意见。1939年2月1日，傅斯年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上表示“边疆”一词必须谨慎使用。“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傅斯年并建议刊物名最好改为“云南”、“地理”、“西南”等，而“边疆”一词废止之。此外他亦提到“民族”一词亦应小心使用，不应“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而造成分裂。<sup>[74]</sup>

顾颉刚显然牢记傅斯年的提醒，2月7日，他在日记之中写到，“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sup>[75]</sup>随后几天他即在傅斯年观点的刺激下撰写了上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1942年顾颉刚在《成都〈边疆周刊〉发刊词》中又表示边疆研究的理想是除掉“边疆”、“边民”等“类乎孽子的”名词之存在：

我们这班人肯挺身而出，尽量做边疆的工作……我们要对外争取自由，必须先对内加强组织。到那时，我国的疆土是整个的，不再有边疆这个不祥的名词存在；我国的民族是整个的，不再有边民这个类乎孽子的名词存在。这才是我们理想的境界。<sup>[76]</sup>

除了本部与边疆（边民）之外，顾颉刚还质疑许多词汇，例如“汉人”“汉族”“五大民族”（“五族共和”）。顾希望以“中华民族”来取代“汉人”“汉族”，当然同时也企图打断“汉人”“汉族”与“本部”之关连。他说“汉人二字也可以断然说它不通……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文化也不是一元，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sup>[77]</sup>他又说“汉人的文化虽有一个传统，却也是无数文化的混合，汉人的体质虽有特殊之点，却也是无数体质的掺杂……汉人体质中已有不少的蒙、藏、缠回的血液”。<sup>[78]</sup>

顾颉刚也批评“汉族”的概念。“汉人的成为一族，在血统上有根据吗？如果有根据，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纯粹的血统，那么它也只是个种族而不是民族。如果研究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统而是已含有大量的满、蒙、回、藏、苗……的血液，那么它就不能说是一个种族。不是一个种族而却富有团结的情绪，那便是一个民族。什么民族？是中华民族”。<sup>[79]</sup>“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个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sup>[80]</sup>顾颉刚的想法和傅斯年一致，傅斯年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sup>[81]</sup>

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质疑“五大民族”，认为“五大民族一名，它的危险性同中国本部这个名词一样……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sup>[82]</sup>“五大民族这个名词似是而非，并没有客观相符的实体。满人本不是一个民族，在今日……固已全体融化在汉人里了，即在当年亦不具一个民族的条件”。<sup>[83]</sup>“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以致有此以讹传讹造成的恶果……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sup>[84]</sup>

“五族共和”这一民国“立国之基”“百部并腔千车一辙”式图解所折射的，是对“共和”理念本身的错位解读。孙中山在《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说：“所谓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发扬光大民族主义，而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

顾颉刚还谈到其他“造了名词来分化我们的例子”。例如，日本和俄国为了抢夺满州，“两国就协调来分赃，从此便有了南满和北满的名词”。英国势力到达西藏之后，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干涉西藏内政，“提出内藏和外藏的名词”。<sup>[85]</sup>再者，“华北五省”则是日本人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合起来的称呼，“这原为这五省接近满州和东蒙……他们要促使这五省快些步东北四省的后尘而另组成一个伪国……还尽催着华北五省的特殊化和明朗化”。<sup>[86]</sup>钱穆也呼应他的说法，而批评“东三省”和“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认为会产生分化的作用。<sup>[87]</sup>

总之，顾颉刚认为本部一词为日本人所造，大约在1900年前后传入中国而盛行与中文世界。他撰文剖析本部概念之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认为这些名词都是帝国主义者为侵略中国、牟取自身利益而创造出来企图分化中国。因此顾的论述主旨在反对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并支持他与傅斯年等人所强调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想法。从清末民初民族观念的演进来说，顾氏于1939

年所提出的一元性中华民族观，一方面批评晚清的“种族革命”与民国初年以来所提出的“五族共和”的主张，另一方面与1943年蒋中正在《中国之命运》中的民族主张有前后贯通而相互呼应之处。<sup>[88]</sup>

费孝通1936年赴英国跟随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攻读博士，1938年归国。时值抗战，他从越南西贡登陆，沿滇越铁路入昆明，任教于其师吴文藻创办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此后在云大组建与燕京大学协作的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日军战机在昆明连番轰炸，社会学研究室被迫迁往呈贡县城的魁星阁（简称“魁阁”），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费孝通并非不理解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良苦用心，他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说：“先生从目前抗战建国的需要上痛论民族意识团结的要紧，拳拳心长，当为抗战建国言论中重要的典章，身为国人，无不憬然自悟！”只是，刚留学回国的29岁费孝通，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理性知识立场，更为关切经由长期历史与社会实践发育养成的族群文化传统。因此对中国多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实态有着切身体察，很难苟同顾颉刚等人置族群文化差异的事实于不顾的“中华民族”理论建构。

顾颉刚的观念受到费孝通的批评，他的焦点不是针对顾氏所谓“本部”观念与日本人的侵略主张，而是“中华民族”是否为一个。费孝通不同意“名词”有分化的作用，亦即对他而言地理名词的政治意涵并不重要。他认为分化的产生是因为本身内部矛盾而为敌人所运用。这使得两人议题讨论的焦点从国际间领土争夺转移为国内的民族问题。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写于1939年4月9日，原载5月1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中质疑顾颉刚上述的论述。他认为顾的目的是“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的统一”。<sup>[89]</sup>费孝通说中华民族应团结一致，进行抗日，但是从学理的角度也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受到尊重。抗日并不必然要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存在。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人群发生共同的利害，有对内稳定、对外安全的需要，自然有可能结成一个政治团体。因此，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样的想法与后来他所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念有延续性。

费孝通也质疑顾对“中国本部”“五大民族”等名词的讨论。顾颉刚指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所以地理上的‘中国本部’，民族上的‘满汉蒙回藏’都是没有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这些名词不是‘帝国主义者造出’的，就是‘中国人作茧自缚’，都是会发生‘分化’作用的”。费孝通首先质疑名词意义及其可能产生的分化作用。他认为“民族”不是不与事实相符的一个团体，顾没有区分 nation（民族）与 state（国家）与 race（种族）等观念，“先生所谓‘民族’和通常所谓‘国家’相当，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费认为一个团体或组织如果健全，就不易受到空洞名词的分化。**他说人们不宜太相信“口号标语的力量”，“这都是把名词的作用看得太重，犯着巫术信仰的嫌疑”。费孝通认为除了留心名词的使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问题是在检查什么客观事实使人家可以用名词来分化我们的国家？我们过去的‘民族’关系是怎样，有没有腐败的情形，有没有隔膜的情形，使‘各种民族’的界线有成为国家团结一致的障碍？”<sup>[90]</sup>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1939年5月1日“边疆周刊”

费孝通其实了解顾的观念在抗战建国上的重要，因此当顾写了《再论本部与五族两个名词》《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来响应费孝通之后，费没有再继续讨论下去。费孝通于1993年在参加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曾回忆此时他与顾颉刚的辩论：“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亟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sup>[91]</sup>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抗战后期在抵御外侮的共识下本部一边疆的讨论逐渐地不受到人们的重视。1940年之后“中国本部”的词汇只有少数经济统计的文章将之作为地理名词来使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威胁的解除、中华民族概念扩大、现代国家的确立，此一词汇日渐式微，在现代英语中 China Proper 一词用法已减少，而中文之中“中国本部”一词已非常少人使用。<sup>[92]</sup>

1940年代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中提出“中华民族”之内的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应改称“宗族”的观点（简称“宗族论”），包括中共在内的许多人斥为否认民族客观差别、不承认少数民族存在的“大汉族主义”。《中国之命运》因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遭到中国共产党组织撰写出版的《评〈中国之命运〉》针锋相对的反驳与批评。

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自从蒋介石成为所谓的圣人和英雄后，这里的学者们反抗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直言不讳的行动。金岳霖拒绝看《中国之命运》，社会科学家认为这部书废话连篇，对其表示不屑并感到耻辱。学术界普遍发出不满的声音。

然而由于抗战时期蒋介石的独特地位，该书出版30天发行15万册，在政府推动下，很快在中国发行100万册。“宗族论”得到广泛播扬，一度成为“正统”。退败台湾后的蒋在日记中反思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对边疆和民族问题的失策是其失去政权的原因之一，并提出了联邦制构想。

## 五、结论

近代中国“本部”概念的演变有两条线索。一方面牵涉元明清以来的地方制度，如“内地”“中土”“十五省”“十七省”“十八省”等观念之演变；另一方面也牵涉到西方中国研究中 China Proper 观念的多重翻译史，两者交织为“本部十八省”而成此一“新名词”。China Proper 词汇的翻译史从中西文文献之中可以清理出一个大致之轮廓，其中包括从欧洲到俄国，再到日本，

最后经由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与《清议报》；维新派的《知新报》等刊物之翻译而带进中国。这些词汇在 20 世纪中国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20 世纪中国本部、边疆等词汇之传播，涉及报章杂志与教科书等材料的流通，这些概念在从西到东的翻译、传播过程之中，亦促成了政治人物与学者之间的辩论。如晚清革命志士以此概念主张“种族革命”，改良派则力倡“五族共和”。1930 年代顾颉刚与日本学者矢野仁一等有关中国本部、边疆，以及满蒙问题有所争执，而费孝通又从多元视角批评顾颉刚之一元的中华民族观。1930-40 年代本部之争议是中华民族讨论的一环，而日后国共两党民族观之分野植根于此，国民党肯定顾颉刚所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共产党则支持费孝通后来所逐渐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观。20 世纪之后东亚疆域变迁及近代中国国家形构与上述辩论有密切的关系。今日看来顾颉刚与费孝通的两个模式，前者强调一元统一、泯除民族边界，后者突出多元而一体。1949 年之后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为基础的“民族识别”从事“民族建构”的工作，实际上加强了少数群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此一理论配合费孝通所主张的“多元一体”的民族观，然而多元与一体的矛盾却造成今日各种的民族问题。诚如马戎所述，“中国的民族构建 (nation-building) 究竟当以‘中华民族’为单元，还是以政府识别的 56 个‘民族’为单元，直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sup>[93]</sup>针对此一现象，当下主张加强“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交”。后来又增加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而有“五个认同”的论述。<sup>[94]</sup>其说法实际上和顾颉刚的理论有更多的亲近性。如何在加强“五个认同”的同时而不排斥对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尊重，而“公民认同”、“公民意识”是否可以配合认同特定政党而纾解族群矛盾，这些问题仍需要吾人做更多的思索与讨论。

## 注释

- [1]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学术月刊》2016 年第 7 期，页 157-173。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 年代至 1795 年》，《学术月刊》2017 年第 4 期（上海），页 145-166。
- [2]例如该文修正了“维基百科”上的解释。“China proper”（汉地），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a\\_proper](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a_proper)（2019 年 11 月 20 日检索）。
- [3]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 年代至 1795 年》，页 162。作者没有注意到 1896 年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即有此一词汇的出现。
- [4]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 年代至 1795 年》，页 164。
- [5]东条文左卫门，《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图》（出版信息不详，嘉永 3 年，1850 年）。
- [6]作者在图中画有三个离岛，分别为“琼州”、“香山”、“厦门”，应该分别指今日的海南、香港与台湾，属于内地十八省。另“琉球”的颜色不同。
- [7]明朝灭亡后，有日本学者认为满族统治下被“剃发易服”的清代中国已沦为蛮夷，而日本才是“中华正统”和“中国”。1672 年林春胜、林信笃的《华夷变态》、1669 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都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而昔日之中原已是鞑虏横行之地，华夏已变成蛮夷。有关此时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观，并视中国为异国的分析，请参看 Ronald P. 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8-230.
- [8]有关东邦协会的历史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参见安冈昭男，「東邦協會についての基礎的研究」，法政大学文学部编，『法政大学文学部紀要』通号 22（东京，1976），页 61-98。狭间直树，『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5)』第三章「亜細亞協会について」第四章「東邦協会について」，『東亞』卷 414（东京，2001），页 66-75。朝井佐智子，『日

- 清戦争开戦前夜の東邦協会：設立から 1894（明治 27）年 7 月までの活動を通して』（愛知县：愛知淑徳大学博士論文，2013）。
- [9] 有关孙中山绘制此一地图时所参考的各种数据，参见武上真理子，「地図にみる近代中国の現在と未来——『支那現勢地図』を例として」，村上卫编，这周六下午学生口译比赛要去当评委，其他时间都可以『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社会経済制度の再編』（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6），頁 329-367。
- [10] 烈支多芬是德国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他是一位旅行家、地理和地质学家、科学家，以提出丝绸之路而闻名。
- [11] 孙中山，《手制支那现势地图识言》，秦孝仪编，《国父全集》（台北：国父全集编辑委员会，1989），册 6，頁 548。
- [12]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11）卷 4，頁 88。
- [13]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 4，頁 98。
- [14] 富山房编辑局，《国民百科辞典》（东京：富山房，1908）。
- [15] 东京开成馆编辑所，《開成館模範世界地図》（东京：开成馆，1930）。
- [16] 名取洋之助，『中支を征く』（東京：中支从军記念写真帖刊行会東京支部，1940）。
- [17] “汉地”，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9C%B0>（2019 年 11 月 20 日检索）。
- [18]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北：三民书局，1976），頁 98-100。
- [19] 陳力衛，「なぜ日本語の『気管支炎』から中国語の「支気管炎」へ変わったのか」，愛知大学中日大辞典編纂書，『日中語彙研究』第 6 号（名古屋，2016），頁 1-25。亦見陳力衛，『近代知の翻訳と伝播—漢語を媒介に』（東京：三省堂，2019），頁 369-390。
- [20]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頁 98。
- [21] 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66-1869），頁 374。
- [22] 井上哲次郎，『訂増英華字典』（东京：藤本氏藏版，1884），頁 239。
- [23] 井上哲次郎，『訂増英華字典』，頁 303。邝其照著、内田庆市、沈国威编，《字典集成：影印与解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頁 153。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頁 163 提到此一译法“极为罕见”。“正中国”的译法与后来通行的“支那本部”、“中国本部”的观念有一致之处，亦即认为只有十八省是真正的中国，或许可以视为为后来的译法铺路。
- [24] 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香港：循环日报，1899），頁 76。颜惠庆，《英华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頁 459。
- [25] “汉地”，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9C%B0>（2019 年 11 月 20 日检索）。
- [26] 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 年代至 1795 年》，頁 154-155。此书有中译本：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
- [27] 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 年代至 1795 年》，頁 157。
- [28] 此书的出版信息如下：Edinburgh: Printed for A. Kincaid & J. Bell and W. Gray, Edinburgh, and R. Morison and J. Bisset, Perth, 1762.
- [29] 此书的出版信息如下：London: Printed for R. Baldwin, No. 47, Paternoster-Row; W. Johnston, No. 16, Ludgate-Street; S. Crowder, No. 12; and Robinson and Roberts, No. 25, Paternoster-Row, 1768-69. 中国本部出现在卷 7 頁 53。

- [30] 此书的出版信息如下：London: Printed for, and sold by the editor; J. Ridgway, York-Street; and W. Button, Paternoster-Row, 1795。
- [31] 中属鞑靼（Chinese Tartary）中的“鞑靼”是多个族群共享的名称，包括以蒙古族为族源之一的游牧民族，然其含意在不同时代差异很大，有时亦将满州与蒙古合称鞑靼。参见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页 164。
- [32] 内田正雄编译，『輿地志略』（东京：文部省，1870）卷 2，页 1-2。陈波提到松山栋庵（1937-1919）编译『地学事始·初輿地志略』（东京：庆应义塾出版局，1870）说“西藏在支那本部之西”。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页 162。然核对原书卷 1 页 11，作者的原文实为“西藏……占支那本国之西”。
- [33] グリウリンヘルド 著，菅野虎太郎译述，『万国地志略』（东京：养贤堂，1874）。
- [34] 参谋本部管西局编，『支那地志』（东京：参谋本部，1887）。
- [35] 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页 165-167。
- [36] “元清非中国论”，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B8%85%E9%9D%9E%E4%B8%AD%E5%9C%8B%E8%AB%96>（2019 年 11 月 20 日检索）。
- [37] 如“我支那本部四万万万人，其种族皆合一，未尝有如奥斯马加国中德意志人与斯拉夫人相竞之事”。梁启超，《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刊《清议报》，第 26 期（东京，1899），页 6。
- [38] 露国陆军少将プーチャート著，「清国边备に対する露国の攻守論」，『東邦協會会報』第 27 期（东京，1896），页 1-15。「清国边备に対する露国の攻守論(承前)」，『東邦協會会報』，第 28 期（东京，1896），页 1-24。1890 年代日本对俄国东方策略十分关注，翻译了一些俄文书籍，如ウエニユコーウ著，『露国東洋策』（东京：哲学书院，1893）、ア・ヤ・マクシモフ著，『露国東洋策』（东京：哲学书院，1896）等书。
- [39] [日] 古城贞吉译，《中国边事论》，《时务报》第 12 册（上海，1896），页 20 上。
- [40] [日] 古城贞吉译，《中国边事论（续第十二册）》，《时务报》第 15 册（上海，1897），页 19 下。上文有关蒙古的部分见「清国边备に対する露国の攻守論(承前)」，《东邦协会会报》第 28 期（东京，1896），页 1。原文是“……杳渺たる无边の原野我西伯利并に支那本部の間に介在し而かも土地不毛人烟稀少……”。
- [41] 例如“察哈尔汗林丹者，振发暴威，凭凌所部，于中国本部之北方，独立称汗，且至强使明朝纳贡”（第 15 册，页 20 上）；“以军事而论，分蒙古地理为二，西北为山地，东北为平原，而首要之处尤映我眼中者，则为东部平原地。何则，我入中国本部，此为最近捷之地也”（第 15 册，页 20 上-20 下）：“吉林府在满洲中部，大道可通四方，东至于海，南直达中国本部，其要路有三条”（第 18 册，页 23 上）。
- [42] D. V. Putiata 的生平考参 Alex Marshall, *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 and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31, 32, 79-80.
- [43] 东亚同文会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对支回顧録』（东京：东亚同文会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1936）上册，页 677。
- [44] 颜惠庆编，《英华大辞典》，页 1773。
- [45] 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e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p. 1116.

- [46][日]肥冢龙，《支那保全及满洲处置》，《清议报》第75册（东京，1901），页4735。
- [47] V.G.T.生，《英德于扬子江之竞争》，《江苏》第8期（东京，1904），页87。
- [48] 吕志伊，《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云南杂志》，收入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77），卷2下册，页829。
- [49] 参见“洪秀全诗：先主本仁慈，恨兹污吏贪官，断送六七王统绪；藐躬实惭德，望尔谋臣战将，重新十八省江山”；石达开文：为招集贤才，兴汉灭满，以伸大义事。照得胡虏二百年，岂容而污汉家之土；英雄十八省，何勿尽洗夷尘之羞”。徐珂，《洪秀全联合会党》，《清稗类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会党类”，页146。
- [50] 邹容的《革命军》，收入邹容、陈天华著，《革命的火种：邹容、陈天华选集》，黄克武、潘光哲主编，《十种影响中华民国建立的书刊》（台北：文景书局，2012），页24。陈天华的《狮子吼》，收入邹容、陈天华著，《革命的火种：邹容、陈天华选集》，页81。
- [51] 章炳麟，《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页262。章氏文章中用“中国本部”之处甚多，如“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辑里语，作今方言。昔仁和龚氏，盖志此矣，其所急者，乃在满洲、蒙古、西藏、回部之文，徒为浩侈，抑末也！仆所志独在中国本部，乡土异语，足以见古字古言者不少”。章炳麟，《丙午与刘光汉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页158。又如“今计中国本部及新疆、盛京、吉林、黑龙江四省，大校二千四百万方里，为州县千四百，丁口则四万二千万有奇”，章炳麟，《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页312。
- [52]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5期（东京，1903），页7-33；第6期（东京，1903），页23-32。引文见期6，页23-234。参见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2期（2002），页106-114。有关近代中国受日本“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参见王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
- [53] “十八星旗”，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5%85%AB%E6%98%9F%E6%97%97>（2019年11月20日检索）。
- [54] 倪菊裳，《中华民国的国土演说》，收入上海新北门振武台国民教育实进会，《军中白话宣讲书》第4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页9。此一说法忽略了汉族的复杂性与文化性，以及许多汉族之外的人住在所谓“本部”之内。
- [55]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1924年3月14日，卷1，页74-75。
- [56] 罗从豫，《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与中国本部贸易之回顾》，《中行月刊》第7卷第4期（上海，1933），页1-13。
- [57]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1937年1月10日，第7版。
- [58]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6，页372。
- [59]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第4卷，1939年4月15日，页221。  
“前在《益世报》发表两文，方神父告我，转载者极多，如《中央日报》、《东南日报》、安徽屯溪某报、湖南衡阳某报、贵州某报，皆是。日前得李梦瑛书，悉《西京平报》亦转载，想不到此二文乃如此引人注目。又得万章信，悉广东某报亦载”。
- [60]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第1期（南京，1947），页3-7。
- [61] 顾颉刚，《发刊词》，《禹贡半月刊》卷1期1（北平，1934），页2。

- [62] 顾颉刚,《考察西北后的感想》,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85。此文为1938年10月18日在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讲演。
- [63]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88-93。  
顾颉刚,《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17-122。
- [64]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页169、171、174。
- [65] 顾颉刚,《昆明〈边疆周刊〉发刊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321。
- [66]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页174-175。
- [67]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前线》第2卷第2期(绍兴,1939年12月21日),页21-24。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复兴旬刊》第8、9期合刊(宁波,1939年3月21日),页2-3。
- [68]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90。
- [69]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页90-91。
- [70]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页90-91。
- [71]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页91。
- [72]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页90。
- [73] 顾颉刚,《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18。
- [74] 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收入《傅斯年遗札》(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页721-722。
- [75]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页197。
- [76] 顾颉刚,成都“《边疆周刊》发刊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329。
- [77]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97-98。
- [78] 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13。
- [79] 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28-129。
- [80]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6,页372。
- [81] 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收入《傅斯年遗札》,页722。
- [82]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95。
- [83] 顾颉刚,《再论“部”和“五族”两个名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20。
- [84]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98-99。
- [85] 顾颉刚,《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18。
- [86] 顾颉刚,《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20。有关日本人创造的“华北”之概念,参见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编,『华北の発見』(东京:东洋文库,2013)。
- [87]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页100。
- [88] 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究》总214期(北京,2016),页20-25。
- [89]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36。

- [90]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40。
- [91]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收入《费孝通全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卷14,页269-270。
- [92] 值得注意的是维基百科 China Proper 的中文词条本来是采用“中国本部”,最近已改为“汉地”。这应该是由于“中国本部”一词几乎已经不为人们所使用。
- [93] 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页24。
- [94] 《“五个认同”:从思想上增强各民族大团结》,“中央统战部网站”,  
<http://www.zyztb.gov.cn/tzb2010/S1824/201710/1a269b48e7b54125a3e1216c97597d2d.shtml>  
(2019年11月20日检索)。
- 有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演变及其与中日战争、中日文化交流的关系,参见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究》总214期(2016),页4-26。

## 【论 文】

### 以国家说民族: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思想的特色<sup>1</sup>

罗志田<sup>2</sup>

**摘要:** 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所形成的一个历史范畴。范文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里论证中国自秦汉时起就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具有相当的难度。然而若在更宽泛的思想语境中理解,一字双关的“nation”在译成中文后因社会实践中的“在地化”而演化为各种具体的内容,不复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概念。范文澜以重塑的方式唤醒过去,却也让民族国家突破了“现代”的范围。故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概念的在地动态变化,以及中国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时代背景,是理解范文澜“以国家说民族”论述特色的要素。

**关键词:** 民族; 国家; 民族国家; 范文澜; 名相; 在地化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sup>3</sup>中,有关“汉民族形成”的争论是因范文澜回应叶菲莫夫关于中国民族形成时间的见解而引发的。从更宽广的学术层面来看,当年的争论与近些年国际学界非常关注的族群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体上,整个20世纪西方关于“民族”的思考,包括其他地方受西方影响的言说,都是以欧洲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为基础的,与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直接的关联。其共同见解,即民族国家是“现代”现象,民族主义也基本是现

<sup>1</sup> 原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55-66页。

<sup>2</sup>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sup>3</sup>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

代的产物<sup>1</sup>。范文澜关于中国成为统一国家及汉民族形成的见解，直接挑战了所有这些理论<sup>2</sup>，故其意义远不止于“汉民族的形成”。这样一种特别能“与国际接轨”的特色，正能表现其生命力之强<sup>3</sup>。

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思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民族与国家的关联。本文侧重于范文澜的认知特色，从其思考的轨迹及其关注之所在，反思民族与国家那一体两面的关联，进而从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时代背景以及族群荣誉对民族自信的重要性中去理解范文澜何以凸显中国历史的“光荣”面相。

范文澜曾明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这就“可以说是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始”<sup>4</sup>，即把“统一的国家”作为民族形成的基本背景条件。沿此论证理路，他先说中国自秦汉时起已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随即提出“汉族自秦汉以下，……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sup>5</sup>。

斯大林曾明确指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所形成的一个历史范畴<sup>6</sup>。这一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已为多数学人熟悉，故范文澜的主张反对者多而赞同者少。根据一般的理解，民族是现代的产物；在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语境中，民族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范文澜的看法，既不同于今天的一般观点，和当时流行的斯大林学说也不尽相同，而他关于中国何时成为统一国家与汉民族何时形成是相辅相成的具体见解，也未曾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

其实从晚清开始，民族与国家的密切关联虽不一定众皆赞同，却也相对“广为人知”，未必有多特别。然而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不仅被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且与特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也就疏离于国家了。范文澜的批评者注意到他的认识特点，以为他“把民族和国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他们秉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认为“秦汉以来中国虽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并不能因此便说汉族已形成民族”，故不认可范文澜的主张<sup>7</sup>。

然而范文澜的看法也并非凭空而来。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和“国家”，都是近代引入的外来新词。若严格就名相论，两者的概念当然是不同的（却也有相通甚或相同之处）。不论在其原产地还是在中国，两者本身又都是在发展中形成的概念，且一直处于变动中（以后还会变）。从清季开始，民族和国家就是中国人广泛思考的议题，并随之出现了众多歧异的想法。对这类意义波动而意思相近的名相，其差异固不能忽视，其相关性可能更须关注。

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取向<sup>8</sup>，提示出在地的情形可能直接影响到名相的指谓，尤其是当

<sup>1</sup> Ernest Gellner, *Nation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Anthony D.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199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3;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sup>2</sup> 不与“民族国家”挂钩的民族，虽众说纷纭，但大体被认为是古已有之，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民族便是。近年西人对民族主义的追溯也越来越早，前些年追到15世纪，现在已到古罗马了。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aspar Hirschi, *Th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An Alternative History from Ancient Rome to Early Modern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sup>3</sup> 与其他几朵“金花”相比，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在当年数量最少，在后来的学术回顾中陈述也较弱，但相关争论一直在延续，可以说生命力最强。张谋、魏鸿鸣、马守正：《建国五十年来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4期；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与民族问题论辩》，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29-250页。

<sup>4</sup>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范文澜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sup>5</sup>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编辑部：《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2-13页。

<sup>6</sup> 《斯大林全集》第2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5-301页。

<sup>7</sup> 蔡美彪：《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讨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41页。

<sup>8</sup>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名相所指称的事物处于能动状态时。民族和国家固然有其基本特征，却也有所在时空中的特色<sup>1</sup>。德里克曾专门论述过“民主”概念因“在地化”而转变<sup>2</sup>，民族和国家亦然。凡可能进入行动的概念不仅是抽象的，更是可转化的，并经常在实际运动中因当事人的不同理解和活动转化为多种带社会性的概念。由于时空因素的作用，民族在社会实践中便常被“在地化”为各种具体的内容，而不复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这些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引申义，与它原本的含义已有所疏离，需要从当事人的互动中挖掘出来。

民族和国家都可以视为人类历史上某种生活共同体的表述<sup>3</sup>，尽管各有侧重，但若两者在特定地域的单位时间里表述的是同一共同体，恐怕不宜脱离时空语境而就概念论概念<sup>4</sup>，更不必为了显示严谨，就一定要将其区分看待。实际上，在较长的历史时段里，民族和国家的确关联密切，故在某些语言如英语里，“nation”一词既可以表述“民族”，也可以表述“国家”，还可以表述“民族国家”。要认识范文澜究竟是“把民族和国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还是注重并强调其在特定时空中的相互关联，或可先从这一外来语的词义进行辨析。

## 一、一体两面的“哪逊”

民族、国家以至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都是20世纪初才开始在中国读书人中逐渐普及的日式汉字词。由于它们自身在日本也多是外来词，尤其“民族”一词本身就是和“族民”竞而后存的产物（我甚至猜测梁启超及其他一些中国人在此竞争过程中起过不小的作用）<sup>5</sup>。这类词语在被引进中国之时，其自身的含义仍在发展之中，歧义不少。有日本学者指出，正因“同样一个‘民族’的用语，其概念明显不一”，可以说时人“将这个译词为‘民族’时，就播下了今天令我们烦恼的意义混乱的种子”<sup>6</sup>。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既然今天的日本人还在为这一名词的多义而烦恼，想想当年那些引用的中国人，有的未曾辨析而混用，有的据一知半解进行未必正确的辨析，不啻在同一空间里隔空辩论，给时人和后人都造成不少的困扰<sup>7</sup>。过去学界偏于落实“民族”一词经何人在何时引进中国<sup>8</sup>，这样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关于“何人何时”的追溯中那些细节性演变，恰提示出“民族”一词进入中国本带有随机性，并非一个“谋定”而后引进的概念。所以不仅要注意进入中国的“民族”一词在原地的（不同）含义，更要辨析作为受众的中国人何时形成一个众皆认可的认知（也可能是以为众皆认可实则各说各话）。

<sup>1</sup> 罗宾逊曾说，“有多少被侵略的地方，就有多少种歧异不同的帝国主义”。Ronald Robinson, “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 with or without Empire,”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273. 据此或可说，有多少种“族群”（Ethnic groups）成长的经历，就有多少不那么一样的民族。与民族相关的国家亦然。

<sup>2</sup> Arif Dirlik,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iography of May Fourth Period,” *Republican China*, 12(1), 1986, pp.6-7.

<sup>3</sup> 关于民族与政治共同体，可参见田耕：《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弗莱堡演讲”到“经济与社会”的两条思路》，《社会》2020年第6期。

<sup>4</sup> 作为概念的名相和行动中的名相，都必须重视。忽视名相在实际应用中的起伏，让概念仅停留在纸面，显然不利于我们对名相的理解。

<sup>5</sup> 如在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或《国家学》的早期译本中，“Nation”被译作“族民”，以区别于“国民”（Volk），而梁启超在借鉴中则径改为“民族”。详另文。

<sup>6</sup> 内崛基光：《民族的意味论》，《民族的生成と论理》，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第3页。转引自王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9页。

<sup>7</sup> 如汪精卫曾学日本说法区分民族与国民，说民族是“人种学上之用语”，而国民则是“法学上之用语”；前者是“自族类的方面言”，而后者则“自政治的方面言”。参见精卫：《民族的国民》，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83页。汪说看似严谨，实不甚通，详另文。

<sup>8</sup>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近代中国人在相关概念上的歧异认知,与外来名相的翻译直接相关。孙中山就曾说:“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按:即“nation”)。‘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这个字在外国“虽然有两个意思,但是他的解释非常清楚,不容混乱”。而在中国就不同,由于“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或不如把“哪逊”译为“国族”。换言之,在外国说“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是不适当的,而在中国这么说就是适当的<sup>1</sup>。话虽如此,由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已经流行广泛,孙中山仍沿用他自己曾经的创造,更多以民族主义而非国家主义说“哪逊”。

这段话的主旨是“nation”一字双关,兼表民族与国家两义。孙中山在辨析时特意用音译,最能提示这类名词译成中文可能造成的误会。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实际政治领域里,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之间曾经有过真正可以说得上“殊死之争”的对抗,但双方奉行的主义在西文中是同一的,故被马君武视为“自相冲突”<sup>2</sup>。然而当事人看重的并非词源,乃是不同的中文字义在实际行动中带来的政治畛域。李璜明确指出,把“nationalism”译作“民族主义”并不妥当,可能强化人和种族之意,而淡化“一定领土、相当主权的重要意义”,所以必须译作“国家主义”<sup>3</sup>。这种有意的选择性翻译,揭示出社会实践中“在地化”的复杂性。一字双关的名相可以向“单一”发展,则其指谓便很难在纸面界定,而需要从行动中理解。

“nation”这个双关字的选择性翻译可能更多是随意的,如恩格斯在论及“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时说,“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所以十八世纪的质朴的法国人才不讲文明民族而讲警察民族(nations polices)”<sup>4</sup>。那个法语词完全可以译为“警察国家”<sup>5</sup>。而恩格斯这话提示出,民族不仅和国家一样古老,它们在很多时候是可以“合而为一”的。

同时,在地的情形也可以影响到名相的指谓。在说民族和国家方面,中国和外国的情形并不一样。如果外国的说法被视为“普遍”,则中国便是一种“特殊”。而这样一种大范围普遍、本国特殊的例子,并不仅限于中国。钱永祥注意到,历史上德国崛起时便“带有强烈的‘文化特殊主义’倾向”,以“对抗西欧的‘文明普遍主义’”。同样,近代日本崛起时也“用‘超克现代性’奋力对抗西方世界的普遍主义现代性”<sup>6</sup>。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妨说凡是民族的也是特殊的。因为从文化层面而言,言民族便带有对独立的强调,似乎不能不有所特殊,而这里的民族,当然与国家相关。

韦伯(Max Weber)就特别看重二者的关联,以为对民族的定义不应只考虑“建立了民族共同体”这一“共同品质”,而更应考虑是否建立了“独立的国家”这一目标<sup>7</sup>。对于曾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国家的第一要义正是在统一基础上的民族独立。在这些地方,独立的含义远比在欧洲更重要。所以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民族解放就比在欧洲更具正当性。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正是东亚和东南亚共产主义革命的显著特征<sup>8</sup>。范文澜关于汉

<sup>1</sup> 不过孙中山也承认,“民族与国家相互的关系很多,不容易分开”。要把两者分别清楚,最适当的方法,是看“民族和国家根本上是用什么力造成的”——“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前者是王道,后者是霸道。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5-186页。

<sup>2</sup> 马君武:《读书与救国》,《晨报副刊》1926年11月20日,第45-46页。

<sup>3</sup> 李璜:《国民教育与国民道德》,李璜、余家菊:《国家主义的教育》,台北:冬青出版社,1974年,第71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4页。

<sup>5</sup> 在其他领域的言说中,“警察国家”的说法似比“警察民族”更常见。恩格斯所说的“警察国家”不是后来常说的意思,而更多地指向广义的行政管理以确保国民能平安、有序地生活。Marc Raeff, *The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Law in the Germanies and Russia, 1600-18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p>6</sup> 钱永祥:《导读 韦伯:“大国崛起”的思想家》,沃尔夫冈·J. 蒙森:《马克思·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VI页。

<sup>7</sup> 沃尔夫冈·J. 蒙森:《马克思·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第53页。

<sup>8</sup> Stephen A. Smit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Commu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 此承四川大学历史学系王果老师提示。

民族形成的基本观点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也带有类似的特点。或因此，他一直把国家和民族关联起来认识。

如果说把国家和民族这样关联认识与斯大林界定严格的民族理论有些距离，使20世纪50年代一些执着于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人不那么容易理解，但这样的认知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取向相近，与恩格斯尤为契合。毕竟国家和民族都是发展中的历史范畴，而它们的发展往往是相互伴随甚或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说到，“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人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而城乡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sup>1</sup>。后来恩格斯又加上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科学的作用来概括“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演化<sup>2</sup>。可知国家和民族虽代表着不同“过渡”的结果，却是关联密切的共生体<sup>3</sup>。

而民族和国家因关联而成为一体，也是一个历时不短的发展进程。欧洲的民族国家大体是在帝国（特别是查理曼帝国）崩溃后逐渐形成的。在中世纪后期的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王权曾是（反封建的）民族统一之保障，民族国家“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sup>4</sup>。然而“nation”义本近于“people”，作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人民横向对应着其他国家的人民，纵向则对应着在上的君主，于是王权又渐成民族国家的反面。伯伦知理（J. K. Bluntschli）就指出，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将拿破仑一世所灭之各国旧王朝基本恢复。要到19世纪中叶，政治风气才转向注重民族精神<sup>5</sup>。

梁启超曾用孟子的话来表述伯伦知理眼中欧洲国家思想的变迁：“十八世纪以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最后一段可能增添了一些梁启超自己的憧憬，未必是伯伦知理的原意，然他大体领悟到伯氏把“君主制”（monarchy）和民族精神视为对立物的意旨，故以为“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sup>6</sup>。此所谓“完全国家”，大体便是近代民族国家。

从19世纪中叶起，这种新的民族国家形式如迅风之扫秋叶，所向披靡，逐渐遍及全球。如列宁所说：“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sup>7</sup>不仅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发展的进程，它的表述亦然。或因“哪逊”的一语双关，在后来的英文写作中，民族国家的称谓也渐由“nation”转为“Nation”，以及更精确的“nation-state”，以彰显其既民族又国家的指谓<sup>8</sup>。近代引入中国的“国家”观念，就是这样一个以“民族”为“国家”要素的认知<sup>9</sup>。刻意把“民族”和“国家”区隔而分别界定之，应是更细密的西学学科植入中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的事了。

从上面的简单梳理中可以看到，“哪逊”本就一字双关，更常在社会实践中被“在地化”为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6页。

<sup>3</sup> 马克思主义到，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里，“nation”就既有与“people”同义的“民族”之意，也有“邦”的意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地425-426、495-496、507页。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sup>5</sup> 伯伦知理：《国家学》，东京：善邻译书馆，1899年，第23B页。此书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孙青老师代觅，特致谢忱。按此民族精神约近于民族主义，这牵涉到民族主义本身的确立。与现在的研究把民族主义的起源追溯得越来越早不同，19世纪后期的人常把民族主义视为一个刚刚兴起的新生事物，详另文。

<sup>6</sup> 参见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12页。

<sup>7</sup>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1页。

<sup>8</sup> 德语的情形又更复杂，在恩格斯的论述中，似有一个从统一的“民族”（Volk）到现代“民族”（Nationalitäten）再向“民族”（Nation）以及“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发展的取向。而比他年长的伯伦知理则强调德语中“Nation”更具族性，“Volk”更具政治性，即“Volk”比“Nation”更亲近于国家。详另文。

<sup>9</sup> 王缉思以为，“把所有国家都称为‘民族国家’的习惯”，是“将西方典型经验理想化”的结果。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年第5期。

并不一致的具体内容，其实很难视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概念。而民族和国家经过一个历时不短的发展进程，因关联而成一体，逐渐成为一定时段里“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更因“适者生存”观念与现代性挂钩，民族国家乃成为“现代性的终极载体”，能现代化者生，不能者亡（或成殖民地）<sup>1</sup>。在这样的语境下，从概念上将二者区隔辨析，虽不失为一种“纯学理”的认知，却也容易忽略民族国家形成的复杂和多元性。

然而如上所述，到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已经较为普及，由于民族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与国家的关联就明显弱化。这不仅是所谓时代背景，很多追赶新时代的学者的确也是这样思考的。故范文澜要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甚或奴隶时代）说民族，还要强调其与国家的相互关联，确难获认同。说他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的人，多半出于真心（尽管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两个概念了然于心，也还可以斟酌）。

进而言之，对于参与到社会实践中的概念，在尊重其普遍意义的同时，更要关注其在应用中的“在地化”发展。范文澜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诠释中国古代民族与国家的关联的，他既要尊重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和民族理论的基本观念，又要让中国的在地因素能够表述自己，而不是被人表述。在此努力中，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也从抽象转化为多少带有特殊意味的具体内容。从范文澜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来看，他并未混淆不同的概念，而是在中国语境中重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

## 二、民族与国家：从范文澜的论述看名相在地化

傅斯年很早就曾说，“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而“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故“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sup>2</sup>。他明确了“种族”是“race”，不过所表达的更多是我们现在所说民族的意思。或可以说，把民族和国家关联起来认识和理解历史，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特色。而范文澜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里进行相应的处理，情形又不甚同。下面的探讨，要适当兼述马恩列斯的相关论述（特别是范文澜引用过或与其观点相关的论述），也尝试在更宽泛的思想语境中理解范文澜的“民族”论述。

林耀华曾详细比对了马恩列斯著作中涉及“民族”的原用词，大体得出列宁特别是斯大林所说的“民族”主要是现代民族的结论<sup>3</sup>。列宁和斯大林在把民族形成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联系起来的同时<sup>4</sup>，也更多就民族说民族，而较少把民族与国家关联并论。但他们也不时并言民族与国家，如列宁就曾区分世界上“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sup>5</sup>。斯大林也说过，“凡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时间上大体一致的地方，那里的民族自然就具有国家的外貌，发展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sup>6</sup>。

列宁和斯大林的相关言说都在20世纪多少反映出民族认识本身的“现代化”。他们的表述似乎提示出，在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时空中，民族与国家常自然关联；而在资本主义比较“完全”时，民族就表现出与国家脱钩而“独立”的趋向（与此前梁启超把近代民族国家视为“完全国家”，颇显异趣）。

范文澜的论述理路，与他论证这一问题的整体取向相类，仍是先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sup>1</sup> 德里克主讲：《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sup>2</sup>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续）》，《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20日，第4版。

<sup>3</sup>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sup>4</sup> 不仅斯大林这么说，列宁也认为“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sup>5</sup>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0页。

<sup>6</sup> 《斯大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页。

相关论述，然后以实例证明这些现象在中国早已存在。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是在封建中“找”资本主义，大致看到了其论证特色<sup>1</sup>。范文澜正是要说明，在“封建”的中国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他以《礼记·中庸》中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印证斯大林所说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和共同经济等民族四要素在秦汉时已大体具备<sup>2</sup>，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范文澜两次引用列宁《论国家》中关于“剥削形式的变换，把奴隶制度的国家转化为封建制度的国家”，以论证商朝是“奴隶制国家”，而周朝是“初期封建制度的”国家<sup>3</sup>。沿此取向发展下去，“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从此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而“中国和欧洲不同处，在于使分裂的国家成为统一国家的经济联系，欧洲是由资产阶级实现的，而中国则是封建时代就实现了”<sup>4</sup>。

斯大林关于“凡是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时间上大体一致的地方，那里的民族自然就具有国家的外貌”一段话，范文澜也曾引用。他本可借以论证“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有密切的关联，而当此关联存在时，“民族自然就具有国家的外貌”；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论证中国很早就发展成中央集权的封建民族国家。不过他当时并未这样立论，或许没有料到很多同时代人会质疑民族和国家的关联性。

在范文澜看来，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得到统一国家的支撑，他总结说：

汉族有高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即：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开始了封建制度社会，从而有可能变化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的独特形态；又从而有可能很早就形成民族。这种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民族的很早形成，不仅使它本身因国家统一而得到继续的成长，也使它有可能得到长期的时间，去融合四周的许多落后部落或部族到本族里面来。<sup>5</sup>

也就是说，中国自秦汉起就成为统一国家，是因为西周封建社会变化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的独特形态，因此可能很早就形成民族，而国家统一乃是这种很早形成的民族得以继续成长的基础。所以，中国自秦汉起，“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并且随着北宋后国内经济联系的强化而更趋稳定<sup>6</sup>。

就全世界而言，不仅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后的民族也仍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恩格斯就注意到，从中世纪开始的各族混合发展过程中，“在一个地方发生了融合，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发生了分离”<sup>7</sup>。而中华民族却有着长期融合而不分离的特色，这与中国这个国家“能够保持长期的正常的统一状态”是分不开的。范文澜这里说的“长期”和“正常”，针对的是东汉末年后的“三国”和唐末以后的“五代十国”这两次“短期的、变态的”封建割据<sup>8</sup>，而因应的则是斯大林所说的“消灭各该族人民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各该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sup>9</sup>这一论断。

如恩格斯所说，国家的出现，“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同时也“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sup>10</sup>。这

<sup>1</sup> 按原话是说范文澜“把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特征拿到封建时代去找”。蔡美彪：《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讨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40页。

<sup>2</sup>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5-59页。

<sup>3</sup>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1950年第2卷第1期；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简编》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57页。按：范文澜用的是旧译，新版《列宁选集》字句略不同：“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33页。

<sup>4</sup>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1、15页。

<sup>5</sup>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15页。

<sup>6</sup>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49页。

<sup>7</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18页。

<sup>8</sup>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49页。

<sup>9</sup>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6页。

<sup>10</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页。

样一个超出血缘关系和地方局限性的共同体，大致就是斯大林说的“民族整体”，彰显出民族和国家的关联，所以范文澜把斯大林所说的“民族整体”理解为“民族国家”，强调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一个持久的相当巩固的整体”<sup>1</sup>。

在民族和国家的长期关联方面，反驳范文澜最有力的魏明经其实和他思路相近（只是不说汉民族而说汉部族）。魏明经认为，如果说“汉族最初乃是在封建的汉帝国型铸下所形成的共同体”，这样的汉部族，“在当时确只具有国家领土的特征”；同时，“中国原来是说的统治部族的本部”，其后在悠久的共同生活中逐步同化其他共同体而形成“近于稳定的共同体”，则“以中国说汉族恰好说明这一部族在同化中的扩展情况”。历代地主阶级统治者对异族实行强力镇压和同化政策两种手段，在后者奏效时，就会以“同种同文号召全民”，而“这时地主阶级口中的汉族就也和国家没有区别”<sup>2</sup>。

魏明经进而以孙中山曾提出“驱除鞑（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为例，指出孙中山那时还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故“把赶走满族当成恢复中华的条件”，他说的中华“不含有满族的成分”而“中华在这里既是指的汉族，也指的是国家”。孙中山实际是“以国家说汉族”，与他后来提出民族主义，“把民和族联系起来，以民说族”不同。在孙中山的思想里，有一个“从和鞑（鞑）虏相对的汉族进到汉民族，或从封建的国家整体进到民族整体”的观念进展，这“表示着客观历史的进展”<sup>3</sup>。

换言之，中国从汉代到清末，国家和民族长期处于一体两面的态势。述说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自然离不开国家。斯大林曾说：“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sup>4</sup>中国这种国家和民族一体两面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共同体的两种不同表述。从秦汉到20世纪50年代，不论是民族的形成还是维护，都与国家休戚相关，需要与国家关联起来认识。“以国家说民族”不失为一种适当的甚或必要的论证方式，不能说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尽管这种取向从清末就有人提倡，但在很长时间里似不占上风。许之衡曾明确提出中国史当以展现“民族变迁之迹”的“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来取代历代史书那种类似帝王家谱的“断代”<sup>5</sup>。入民国后“断世”主张颇见延续，但更多人有意无意间又回归到“断代”的取向。张东荪就曾指责当时的整理国故者未能以“民族国家主义为标准来估量一切”<sup>6</sup>，而新史学的重要代表傅斯年更明确主张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sup>7</sup>。到20世纪50年代，遂又提出“打破王朝体系”的要求<sup>8</sup>。这口号是双向的，一方面是针对帝王将相，欲以劳动人民为历史主体；另一方面就是对民族国家的重新强调，要以中华民族代替历代王朝而为历史的中心。

我们前些年习惯了“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说法<sup>9</sup>，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著作主要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汉学作品立论，对受了几千年“天下”文化熏陶的中国学人而言，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都是新生事物，据以治史，多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尝试。从“王朝体系”在史学中的持续生命力看，以“民族国家”这一观念来处理历史问题，在中国似未形成控制性的

<sup>1</sup>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50页。

<sup>2</sup> 魏明经：《论民族的产生及中国各民族的演变过程》，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183-187页。

<sup>3</sup> 魏明经：《论民族的产生及中国各民族的演变过程》，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183-187页。

<sup>4</sup>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21页。

<sup>5</sup>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6期。

<sup>6</sup> 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正风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2期。

<sup>7</sup>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0页。

<sup>8</sup> 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5-186页。

<sup>9</sup>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此书现有中译本，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束缚。

无论如何，近代中国发生的意识“大变革”是非常重要的，它让人们一下子要“把历史上的一切都跟‘中国’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整个历史叙述也因此而有所不同。范文澜的做法或有些像以重塑的方式唤醒过去，甚至可能是现代性眼光下“传统的发明”<sup>1</sup>，却又让民族国家突破了“现代”的范围<sup>2</sup>。一个在历史上长期维系的共同体，用范文澜的话说，本是一个“正常”的实际存在，不以名相及其代表的认知方式为转移。且即使以民族国家为目的来建构历史，仍然可以说出限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何况这民族国家本身确有其历史。

按照魏明经的分析，清末是一个转折点，“以国家说民族”的时代终结于此，以后进入一个“以民说族”的时代，国家亦随之淡出。然而进人民国之后，“以国家说民族”的态势并未表现出多大变化，反因日本的大规模入侵而强化了民族与国家的关联。故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时代背景，是理解范文澜观念的一个要素。

### 三、现实中学术：民族自豪与文化自信

范文澜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把秦统一——作为“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起点。那是抗日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也是近代中国被侵略史中的低谷，任何可以增进民族自信的学术见解，都不仅是学理的研求，也是现实的需要。故中国何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民族自信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大量领土被侵略者攻占的背景下，强调中国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着鲜明的针对性。

《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写作是毛泽东提议的，该书的出版也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做的一件大事，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就是把这本书视为中国共产党取得对传统历史文化发言权的象征<sup>3</sup>。可知范文澜关于民族国家基本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现实意义。而从毛泽东此前强调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sup>4</sup>看，这一发言权恐怕不仅是对内的。

那时范文澜也确实想要借写历史为现实服务。在后来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自我批评中，他承认书中“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如“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sup>5</sup>，这一自白最能揭示他写作时的心态，正可看出他强调“长期”和“正常”的用意所在。范文澜具体点出的“借古说今”固然是有意为之，而战时树立民族自信的更大需要，恐怕有意无意间也会影响到他论述的倾向性。

按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看法，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民族矛盾重于阶级矛盾的时期<sup>6</sup>。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有所改变。不过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在1949年的论述，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外部矛盾即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sup>7</sup>。当时中国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面临的整体国际局势却不能说特别有利，所以仍有确立民族自信的需要。

<sup>1</sup> 德里克主讲：《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第200、18页。

<sup>2</sup> 如上所述，范文澜力图说明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即在一地的古代出现了另一地的近代现象，仿佛时间的意义随空间的变换发生了逆转。

<sup>3</sup> 佟冬：《我的历史》，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等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84页。

<sup>4</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sup>5</sup>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第861页。

<sup>6</sup> 当时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矛盾是第二位的，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一切斗争都应服从于民族斗争。参见《中央关于目前正值形式与党的任务决议》，魏建国主编：《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84-100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2-255页。

<sup>7</sup> 参见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修订版）》第7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48-50页。

到1950年，范文澜发展了自己的观点，提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sup>1</sup>，不仅明确了那时建立的是“民族国家”，而且把过去主要说统一的集权国家发展到与汉民族形成相关的思路，进一步把国家和民族联结起来。他在论证中国历史上统一力量总是战胜割据力量时，说到“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暴力和阴谋企图分裂中国，但并不能真正达到它们的目的”<sup>2</sup>，这不仅揭示出在当时反侵略需要的存在，可能也是他坚持“以国家说民族”的一个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共同的受难本身就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支撑点。一个共同体能够长期维系，离不开英雄记忆和共享情感铸成的民族文化自觉。在中国这样重视“向化”远超过征服的文化里，历史记忆中的英雄故事往往和民族的受难相关。而被侵略和反侵略，则直接指向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彰显出民族和国家的关联，也强化了民族自豪这一情感要素在民族自信中的地位。

勒南（Ernest Renan）便强调“民族国家”（nation）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是种族、语言、宗教、共同利益、领土等许多因素沿同一方向融汇而成的结果。其中情感因素尤为重要，因为“一个民族国家是灵魂，是精神原则”。有着伟人和荣耀的共有“丰富记忆的遗产”和“当下的同心同德”一起构成了这一灵魂。简言之，“一个民族国家是一个由过去做出的牺牲和仍愿做出牺牲的情感凝聚而成的伟大共同体”<sup>3</sup>。

在民族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前引恩格斯所说的有些融合有些分离的现象，揭示出族群间存在激烈的生存竞争。在韦伯看来，关于防卫抵御或掠夺迁徙这类“政治共同命运”的群体记忆，是构成部族或民族这类政治共同体的要素。不论是“外来的战争威胁”还是“发动对外战争”的诱因，都因为政治共同体的行动而促成“部族意识”。“民族意识”亦然。“隐藏于‘部族’与‘民族’等意涵模糊的概念背后”的，正是“想要采取政治行动的潜在激昂火苗”。这类政治的临机行动，“特别容易发展成一种‘习俗的’规范”，成为“民族或部族伙伴在面临战争攻击时的团结义务”，最终促成“持久性的政治共同体”<sup>4</sup>。

过往的共同经历，特别是历史记忆中过去共同的牺牲，不仅“使民族成为民族”，也使一个民族对抗其他民族的作为正当化<sup>5</sup>。而民族对抗中最为正当的作为，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斯大林曾说及东欧“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由于自卫（防御土耳其人、蒙古人等的侵犯）的需要而加速”<sup>6</sup>。范文澜在引用这段话后指出，“在中国也有需要自卫的情形”，这种需要“可以成为促进国家统一的因素”，尽管“不是重要的因素”<sup>7</sup>。“自卫”一词提示出“我们”与“他们”的人我之别已然存在，而身当“自卫”之时，强化心同族同的认同感更成为一种必需。

如前所述，范文澜是在对日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提出其基本观点的，那时中国人民抱持“仍愿做出牺牲”的壮志，正在“做出牺牲”。在大量领土被侵略者侵占的背景下，当牺牲就在眼前且可以预期未来仍有牺牲的时候，强调中国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着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和特定的现实意义。

“我们”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及维护，是民族或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要素。同心然后能戮力，战时需要捍卫的不仅是国土，还有与认同相关的荣誉。几千年来以文化自豪的中国人，在近代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自居“天下”之中滑落到“世界”的边缘，历史记忆中的荣耀伟绩，更须钩沉抉隐。而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英雄故事不必皆系于事功，却常表现在

<sup>1</sup>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1950年第2卷第1期。

<sup>2</sup>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49页。

<sup>3</sup> 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What Is a Nation? And Other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61.

<sup>4</sup> 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7-308页。

<sup>5</sup> Eric J. Hobsbawm,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Today,” *Anthropology Today*, 8(1), 1992.

<sup>6</sup>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335页。

<sup>7</sup> 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52页。

文化上<sup>1</sup>。

从梁启超开始，中国人不仅注意追赶西方，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中国怎样能对世界文化做出贡献<sup>2</sup>。当年整理国故流行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把中国的国故整理好，就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何炳松更将其视为中国应负的责任<sup>3</sup>。而胡适一度认为，中国能对世界新文明做出的贡献，就在帮助西人认识他们未看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sup>4</sup>。到抗战快结束时，梁漱溟仍在思考这个问题<sup>5</sup>。

范文澜延续了这样的思绪，他认为只要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丰富的特点发掘出来，就可以“成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sup>6</sup>。这是一句笔锋带有感情的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大框架下，中国的历史研究不仅是整体“中国实践”的一部分，更是中国可能对人类历史做出的贡献。

依我外行的猜想，范文澜坚持西周封建制而反对西周奴隶制的观点，除对史料本身的认识外，也不排除带有树立民族自信的隐意。如他在1951年说：“承认西周初年已开始了封建社会。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远在纪元前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已进化到封建社会，为什么不引以自豪呢？”他强调，“我们反对虚妄的‘自豪’，但证据既确实存在，弃而不用，就未免可惜了”<sup>7</sup>。

就五种社会形态的区分来说，中国在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直接牵涉到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他对秦汉中央集权的凸显，正是要区别于此前已存在的封建国家。可知像五种社会形态这样的重要理论，也并不总是抽象的，有时就与当下的现实发生关联。范文澜强调“自豪”要有证据，体现了学术的分寸感，但这仍是一种对中国历史“光荣”的“自豪”。像他这样的史家，身处明显沦落的近代中国，心存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责任，任何能够让“我人”自豪的证据，恐怕都是很难舍弃的吧。

吴大琨就看出了范文澜的意态，他高调提出历史科学的任务是追求客观真理，中国“在何时算是‘奴隶社会’何时算是‘封建社会’，这是一个科学上的客观真理问题，与民族的‘光荣’与否，可说毫不相干”<sup>8</sup>。然而荣誉感和尊严感乃是形成和维护民族国家的要素，史家即使有意追求客观真理，下意识中那种荣誉感也难免不起点作用，何况身处一个国道中落的时代<sup>9</sup>。

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曾说，“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sup>10</sup>。这是一种对曾经落后现在赶上的肯定。范文澜引用此语后说，“是的，中国人民也有权充满民族自豪感，因为三百五十年前，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驱者为反抗封建统治而作出了斗争的伟大模范”<sup>11</sup>。

<sup>1</sup> 参见罗志田：《守先待后：史学在中国的地位及演变》，《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1期。

<sup>2</sup> 余家菊说得很正确，中国不仅需要“于世界有所‘取’，亦即有所吸收”；还要“对世界有所‘于’，亦即有所贡献”。余家菊：《教育上的国家主义与其他三种主义之比较》，《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上册，台北：慧炬出版社，1997年，第339页。

<sup>3</sup> 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1号。

<sup>4</sup>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03页。

<sup>5</sup> 梁漱溟：《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7-462页。

<sup>6</sup> 范文澜：《百家争鸣和史学》，《学习》1956年第7期。

<sup>7</sup>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第857页。

<sup>8</sup> 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sup>9</sup> 反对范文澜观点的魏明经其实也诉诸情感因素，主张“不能说汉族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就一直不能成为民族”。他说得口滑，甚至说出“如果说帝国主义强盗还算得上是一个民族，那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更有理由说得上是一个民族”这样的话。盖于理虽无据，于心终不忍。魏明经：《论民族的产生及中国各民族的演变过程》，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193页。

<sup>10</sup> 《列宁选集》第2卷，第610页。

<sup>11</sup>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全集》第10卷，第228页。按“自豪感”原译作“自傲心”，范文澜：《绪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23-24页。

他说的是明朝的织工斗争，似乎中国也有“领先”的事例。且不论他具体所说为何，“有权”自豪一语，使那种于失落中有所得心态，溢于言表。

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曾说，“没有过去的民族不成其为民族”，而“历史学家就是过去的制作者”<sup>1</sup>。他这样说当然有所指，不过，就算历史学家是在“制作”历史，也只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制作。当事人固可能穿着“久受崇敬的服装”，用“借来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的一幕”<sup>2</sup>；研究者也受到其生活语境的影响，即使有意把研究对象客体化，怕也会在有意无意间说出一些为时代风云所熏染的话。故立言者和立言时的时空背景，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范文澜提出他的基本观念时是在写通史，不一定是有意选择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但写作《试论中国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则显然是有意为之。他个人的自信也在文章定型中增强，稍后便去掉了最初发表时的“试论”二字，改为《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这不仅更具自信，也是一种表态。毕竟中国何时成为统一的国家、中华民族何时成为一个民族，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涉及民族自信的现实问题。故对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的论说，既要依循学术探讨的理路去认识，也不妨注意时代语境中那些诗外的功夫。

## 【论 文】

### 正统、道统与华夷之辨<sup>3</sup> ——论南宋的“中国”认同及其历史意义

江 湄<sup>4</sup>

**摘要：**受到“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很多中外学者从华夷之辨的视角，将宋代尤其是南宋的“中国”认同看成是种族、文化、国家合一的近代国族意识，并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南宋“中国”认同的历史意义。但是，南宋“中国”认同的建构有三个相关的思想脉络，一是正统论，一是道统论，一是华夷之辨。当我们把正统论、道统论与华夷之辨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为新的“大一统”准备了思想条件。

**关键词：**南宋；中国认同；大一统。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二战后，宫崎市定等人发展了内藤湖南的观点，使“唐宋变革论”更加成熟，对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史研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指出，契丹辽朝、党项西夏、女真金朝的建立，大理、安南的独立，无不可以看作是东亚各民族民族意识的自觉和民族主义的勃发，而“华夷之辨”、“攘夷”思想就是宋朝汉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sup>5</sup>近些年来，在“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下，很多中外学者再次聚

<sup>1</sup> Eric J. Hobsbawm,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Today,” *Anthropology Today*, 8(1), 1992.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1页。

<sup>3</sup> 本文刊载于《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3期。

<sup>4</sup>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sup>5</sup>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

焦宋朝尤其是南宋的“中国”意识，他们大多认为，宋代尤其是南宋的“中国”意识在中国史上具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宋朝已经形成了种族、文化、国家合一的近代国族意识，把自己视为一个单一族群构成的民族国家，“中国”这个名称具有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意涵。<sup>1</sup>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宋朝尤其是南宋的“中国”认同？正如上述研究所显示，从华夷之辨的视角看，宋朝尤其是南宋人的“中国”认同，有着很明显的近代国族意识的色彩。但是，我认为，要真正了解南宋的“中国”认同，必须把华夷之辨和正统论、道统论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那样一来，我们会发现，南宋人的“中国”认同与近代国族观念、民族主义有着极其重要的不同，而只有认识到这种不同，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南宋的“中国”认同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意义。

在南北朝时期，南朝虽自居正朔相传，但未能垄断“中国”名号，在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尤其是东、西魏与南梁对峙时期，“南方不再日北朝为种族、经济、文化全然不同之异国也。”<sup>2</sup>但是，在宋金对峙时期，失去中原且实际向金朝朝贡的南宋不但自居正统，而且自居唯一的中国，始终视金朝为夷狄。钱钟书指出，南北朝时期，北齐人自称“华”而称南朝为“夷”，但金朝人虽自称“华”而目蒙古为“夷”，但并未以“夷”加之于南宋。<sup>3</sup>虽有学者指出，在韩侂胄发动北伐南北交战时期，金朝文士在表奏中多有以“岛夷”、“淮夷”、“蛮方”称南宋者，但平时并没有普遍使用。<sup>4</sup>而在金朝灭亡之后，已归顺蒙古的金朝士人却非常担心日后金史不过作为《宋史》的“载记”而存在。<sup>5</sup>在元修三史的正统之辨中，北方儒士仅仅主张金与宋的平等地位，而实际在政治上处于较低地位的南人士大夫却公然主张以南宋为正统，以辽金为附庸，要求元朝必须继承宋朝之大统，方能为中华之正统。<sup>6</sup>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当然与南宋实际的文化优势有关，而南宋文化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于“中国”认同的建构，而其“中国”认同的建构有三个相关的思想脉络，一是正统论，一是道统论，一是华夷之辨，正是正统论、道统论和华夷之辨的互相配合，构成了南宋“中国”意识的完整面貌。

## 一、“华夷之辨”与“天下主义”的辩证

面对契丹辽朝和女真金朝的威胁，宋朝尤其是南宋的“华夷之辨”，强烈激发了汉族士民在

年，210页。

<sup>1</sup>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有葛兆光：《“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载于《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54-55页；谭凯：《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32页。又见：包弼德：《地理与文化：中期历史中的“中国”话语》，黄应贵、王璠玲编：《空间与文化场域》，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9年；Rolf Trauzettel，“Sung Patriotism as a First Step toward Chinese Nationalism”（陶德文：《作为中国国族主义第一步的宋代爱国主义》），in John W. Haege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5), pp. 199-214; Tillman Hoyt Cleveland. “Proto-Nationalism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The case of Chen Liang”（田浩：《十二世纪中国的原始国族主义？以陈亮为例》）*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9/2 (1979).

<sup>2</sup>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王敦桓温与南北民族矛盾条”，中华书局1985年，105-106页。梁满仓也指出，自太和改制以后，在南朝心目中，北朝的文化形象、政权性质发生变化。《南北朝通使刍议》，载于《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牟发松也指出，孝文帝改革后，积极树立北魏作为中华正统政权的政治和文化形象，对南朝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南北朝交聘中所见南北文化关系略论》，载于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30-38页。

<sup>3</sup> 钱钟书：《管锥篇》第4册“全后魏文卷二一”，中华书局1979年，1487页。

<sup>4</sup> 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sup>5</sup> 修端：《辨辽宋金正统》，苏天爵：《元文类》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589-592页。

<sup>6</sup> 杨维桢：《三史正统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李梦生校点，《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164页。

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意识，严华夷之辨是“宋型文化”的突出特点，<sup>1</sup> 是这一时期具有标志性的思想观念，向来受到学者的重视，研究者众多。

自秦汉以来，历史上历来就有华夷之辨的思想，如班固《汉书·匈奴传》赞、江统《徙戎论》、范晔《后汉书·西羌传》论，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论述。这些论述一般都针对中原王朝于强盛之时征伐四夷或迁徙四夷于境内的做法，以“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主张将夷狄置于“治外”，加强防御，但也要有羁縻制驭的办法。<sup>2</sup> 总的来说，所谓华夷之辨并不强调绝对的种族之见，而指的是文野之别，且为夷狄进于中国留有很大余地。但是，到了宋代，严华夷之辨的思想显然更加激烈和绝对，以至坚决反对让夷狄接受乃至接触华夏文明，认为应该让夷狄安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夷狄一旦接触到了先进的华夏文明，他们的贪欲野心就会被激发出来而给华夏带来祸端。如宋祁在《新唐书·突厥传》论中批评班固“其来慕义，则接之以礼让”的主张，其论曰：“礼让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兽夷狄也。纤丽外散，则戎羯之心生，则侵盗之本也。圣人饮食声乐不与之共，来朝坐于门外，舌人体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汉氏习玩骄虏，使其悦燕赵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绮罗纨，供之则增求，绝之则招怨，是饱豺狼以良肉，而纵其猎噬也。”<sup>3</sup> 宋代的士大夫普遍认为，夷狄介于人与禽兽之间，和华夏有着本性上的绝对差异，根本不能接受礼乐文明，想教化之根本就是自致其祸。如苏轼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sup>4</sup> 刘敞说：“夫夷狄中国，其天性固异焉。是故谨吾色，毋出于礼，以示不可以淫纵为也；谨吾声，毋出于雅，以示不可以污滥入也；谨吾货，毋出于义，以示不可以贪婪有也……彼其还观中国，则若鸟之观渊，兽之窥藜，虽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sup>5</sup> 朱熹说：“至于禽兽，亦是此性，只被他形体所拘，生得蔽隔之甚，无可通处……到得夷狄，便在人与禽兽之间，所以终难改。”<sup>6</sup> 等等，这样的华夷之辨就有了族裔民族主义的色彩了。

南宋初年，胡安国作《春秋传》，将华夷之辨与三纲并列，上升到了天道和纲常的高度，这是以前很少见到的论述，南宋士人无不受其影响。如“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胡传》解释说：“凡经所书者，或妾妇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权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国，皆阳微阴盛之证也。”<sup>7</sup> 又如，“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胡传》解释说：“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听于臣，父有听于子，夫有听于妇，中国有听于夷狄，仲尼所为惧，《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纷，虽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则大伦紊矣。”<sup>8</sup> 这都是说，夫妇、君臣、父子、华夷，皆是准天道阴阳而自然具有的人间纲常。

甚至，对于胡安国来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但是，夷狄却不能行中国之礼，不能进于中国。于“文公九年，冬，楚子使椒来聘”条，北宋刘敞的解释尚且是：“能自藩饰以礼乐者，则谓之中国，不能自藩饰以礼乐，上慢下暴者，则外之中国。内外之别，不在远近，而在贤不肖。苟贤矣，虽居四海，谓之中国可也，苟不肖矣，虽处河洛，谓非中国可也。”<sup>9</sup> 《胡传》却进行了

<sup>1</sup> 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载于《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365页、380页。

<sup>2</sup> 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赞，中华书局1962年，3830-3834页；江统：《徙戎论》，《晋书》卷56《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1529-1534页；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论，中华书局1965年，2899-2901页。

<sup>3</sup> 宋祁：《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年，6025页。

<sup>4</sup> 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苏轼文集》卷2，中华书局1986年，43页。

<sup>5</sup> 刘敞：《治戎下》，《宋文鉴》第2册卷96，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711页。

<sup>6</sup> 朱熹：《朱子语类》卷4，中华书局1994年，58页。

<sup>7</sup>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1“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9页。

<sup>8</sup>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18“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286页。

<sup>9</sup> 刘敞：《春秋意林》卷上，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一番非常复杂的论述，说吴楚本非夷狄，而是中国圣贤之后，当周室衰弱，纷纷僭越称王，有悖君臣大义，是“以夏而变于夷者”，所以《春秋》对于吴楚，“内虽不使与中国同，外亦不使与夷狄等”，如果他们思善改过，能遵行中国之礼，“则进之而不拒”，“以中国之礼待之也”。这样一来，《春秋》“谨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四夷”的大义就贯彻始终，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了。<sup>1</sup> 这其实意味着，吴楚要真是夷狄的话，就永远也进不了中国了。到了南宋末年，郑思肖甚至说：“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诛。”按照这个原则，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就是“僭行中国之事以乱大伦，是衣裳牛马而称曰人也，实为夷狄之大妖。”<sup>2</sup>

然而，胡安国清楚地知道，他所说的如此“严华夷之辨”的春秋大义，有悖于秦汉以来“合天下于一”、“以夏变夷”、“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大一统”理想和天下主义，于“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条，他问道：“戎狄举号，外之也。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天子与天地，参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独外戎狄乎？”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他说：

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外四夷者，王道之用。<sup>3</sup>

可见，在胡安国的论述中，“华夷之辨”与“天下主义”形成一种“体”与“用”的辩证关系。这就是宋人的华夷之辨与近代国族观念的大不同之处，对于宋人来说，“华夷之辨”毕竟是“用”，“王者无外”、“无不覆载”才是“体”，严华夷之辨的目标绝不是造成一个汉族的民族国家，而是要恢复四夷归附中国的本来应然的天下秩序。

## 二、两种“蜀汉正统论”：是“正”还是“统”？

如四库馆臣所说：“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sup>4</sup>南宋诸儒持蜀汉正统论无疑都是捍卫和论证本朝之正统，但他们的蜀汉正统论却有着不同的思想诉求和面貌。

欧阳修在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著《正统论》，完全否定在当时还流行的天命正闰之说，以实际的人间的历史功德而不再是神秘神圣的天命和运数作为“正统”的标准，多有学者论述欧阳修的正统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意义。<sup>5</sup>欧阳修为正统下的新定义是：“《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sup>6</sup>《公羊传》“大居正”的意思是“都天地之中”，在此被转化为以道德作为正统标准，即得天下治天下要合乎道德，“大一统”的本义是“改正朔以一天下”，在此被转化成以统一天下的功业作为正统标准，从此“一统”就从时间之开始义转成空间之统一义。欧阳修的正统论是一个二元论的标准，那使得天下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标志着道在历史中呈现的“正统”，它的标准到底是“正”还是“统”呢？欧阳修自己也很矛盾，但最终落在了“统”上。<sup>7</sup>欧阳修的正统论一提出来，立刻引发了思想史上有名的一场“正统之辨”。

二程没有参与正统之辨，但他们有正统论。有人问：“三国之兴，孰为正？”程颐明确回答：

<sup>1</sup>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15“文公九年冬，楚子使椒来聘”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229页。

<sup>2</sup> 郑思肖：《古今正统大论》，《心史》下卷，“宋集珍本丛刊”90册，线装书局2004年，479页。

<sup>3</sup>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1“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6页。

<sup>4</sup>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5《史部 正史类一 三国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45页。

<sup>5</sup> 参见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收入《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刘复生：《宋代“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sup>6</sup> 欧阳修：《正统论》，《欧阳居士集》卷16，影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115-116页。

<sup>7</sup> 欧阳修：《正统论》，《欧阳居士集》卷16，影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118页。

“蜀志在兴复汉室，则正也。”<sup>1</sup> 皇祐二年（1050年），十八岁的程颐上书仁宗皇帝，自比诸葛亮，说“亮感先主三顾之义，闵生民涂炭之苦，思致天下于三代，义不得自安而作也。”<sup>2</sup> 又曾说诸葛亮有“王佐”之才。<sup>3</sup> 又在晚年《周易程氏传》中把诸葛亮与伊尹、周公并列，说他们是“行道者”。<sup>4</sup> 总之，在程颐这里，诸葛亮之行“王道”是蜀汉之为“正统”的根据。程颐的“蜀汉正统论”是一种具有鲜明道学思想特点的正统论，“正统”统一于“正”，判别正统的标准脱离了授受关系、地域、种族、统一事功等一切具体因素，而完全成了“义理”，这等于用“道德”取消了“政治”，或者说，把“政治”归并于“道德”了。

宋朝结束五代分裂重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在北宋，蜀汉正统论没有多大的市场，以“统”为标准的正统论显然占了主流。<sup>5</sup> 当“中国”被凶残的夷狄侵逼，偏处江南，甚至惨遭亡国，南宋士人亲身经历和体验了历史大势不合乎“天理”。在这样的时势下，道学家的蜀汉正统论，继承程颐之说，将“正统”统一于“正”，用天理对抗、压制历史大势，在不利的政治形势下申张道德优势。后世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将朱熹的蜀汉正统论与其他道学家混为一谈，但其实，朱熹的蜀汉正统论与他们很不一样，而是坚持了“今天下于一”的立场，这是在北宋占主流的正统论。从后见之明看，对中国文明之自我意识的形成发展具有更重要影响的，应该是朱熹的正统论及其道统论。

宋高宗、孝宗时期的蜀汉正统论，以胡寅、张栻、韩元吉为代表，寄托着他们反对和议力主恢复的志意，有着一股强烈的悲情，“义利之辨”这一标准显得特别突出。绍兴十二年（1142）达成宋金和议后，秦桧为了维护和议体制，确立自己的专制统治，使用残酷手段打击主战派和政治对手，严厉控制思想言论，于绍兴十九年（1149）十二月“禁绝私史”，又于绍兴二十年（1150）借“私史案”打击李光等政敌。胡寅（1098-1156）因与李光通书，被贬新州，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才遇赦。胡寅学于杨时，是程学的传人，他在谪居新州期间根据《资治通鉴》写成《读史管见》。胡寅在《读史管见》中将诸葛亮塑造为“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计其利”的道德理想之化身；刘备和诸葛亮虽为君臣而兼“师友之契”，“三代以还，未见其比”；诸葛亮之辅佐后主，有周公之“盛德”。他甚至不满意程颐把诸葛亮和张良、陆贽并列为“王佐才”，说“志士尚友，愿希孔明，而未必为子房。”<sup>6</sup> 胡寅还写了《诸葛孔明传》，在诸葛亮身上寄托自己的志士情怀。<sup>7</sup> 在他的蜀汉正统论中，诸葛亮“明道正谊”的道德形象比之刘备绍继汉统的“顺逆之理”，是蜀汉之为“正统”更重要的理据。

张栻（1133-1180年）是主战派领袖张浚之子，师事胡寅之弟胡宏，主张蜀汉正统论甚力，写了《汉丞相诸葛武侯传》，将诸葛亮塑造成为“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计其利”的理想人格，是三代之后“王道”的人格化身。<sup>8</sup> 他说：汉高祖“其所以建立基本，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之说，相传四百年，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国于蜀，明讨贼之义，不以强弱利害二其心，盖凛凛乎三代之佐也。虽不幸功业未究，中道而陨，然其扶皇极，正人心，挽回先王仁义之风，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可也。”<sup>9</sup> 这是说，蜀汉之为正统的依据，一是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忠义之节，一是诸葛亮以“先王仁义之风”治蜀，二者是统一的。

韩元吉（1118-1181）与道学家有密切的关系，他曾刊刻程颐弟子尹焞的《论语解》，是吕祖

<sup>1</sup> 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2《圣贤篇》，《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1235页。

<sup>2</sup> 程颐：《上仁宗皇帝书》，《河南程氏文集》卷5，《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511页。

<sup>3</sup>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233页。

<sup>4</sup> 程颐：《周易程氏传》卷2，《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786页。

<sup>5</sup> 参见拙文：《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sup>6</sup> 胡寅：《读史管见》卷5“汉献帝十二年”，岳麓书社2011年，184页、196页。

<sup>7</sup> 胡寅：《诸葛孔明传》，《斐然集》卷24，岳麓书社2009年，472-485页。

<sup>8</sup> 张栻：《汉丞相诸葛武侯传》，《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1207-1226页。

<sup>9</sup> 张栻：《衡州石鼓山诸葛武侯祠记》，《南轩集》卷10，《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700页。

谦的岳父，又与朱熹相友善。韩元吉所著《三国志论》，主张称“蜀汉”而不是“蜀”，后人多沿其说。与胡寅、张栻相比，他特别突出了刘备，说刘备与诸葛亮之所以君臣相得，是因为他也抱持“三代之道”，其言行可与尧舜周文王相比。<sup>1</sup>

后世人说到蜀汉正统论，主要的根据就是朱熹的《通鉴纲目》，他们基本上都把朱熹的蜀汉正统论说成是与程颐、张栻、胡寅等一样，以“王霸义利之辨”论正统，但事实上，朱熹的蜀汉正统论并不是这么回事。朱熹继承二程之说，以“王霸义利之辨”将历史断为“三代”和“三代之下”，三代之时，圣人在位，“以德行仁”，诚心正意推行仁政，“王道”大行；三代以后，圣人不在位，而以传道为事，现实中的王者“以力假仁”，为了自家社稷长久才施行仁政，“霸道”大行。他从不以“王道”冠之于三代以后的任何君主。与胡寅、张栻、韩元吉不同，他并没有把诸葛亮刘备君臣当做“三代之道”的理想化身，相反，朱熹认为诸葛亮只是“天资高”，但其学术与作为仍不免“霸者”之驳杂：“忠武侯天资高，所为一出于公。若其规模，并写《申子》之类，则其学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则未尽。’其论极当。”<sup>2</sup>为此，他还和张栻展开论辩。<sup>3</sup>他更没有以“王道”、“义理”作为判别正统的标准，相反，他的正统论强调的是统一天下的事功。正如赵金刚所论述，在朱熹这里，三代以后，“道统”和“正统”乃是两码事，“正统”之为“正”的标准并不在于“德”而在于“功”。<sup>4</sup>有人问朱熹说：

“正统之说，自三代以下，如汉唐亦未纯乎正统，乃变中之正者；如秦西晋隋，则统而不正者；如蜀东晋，则正而不统者。”

朱熹回答说：“何必恁地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其有正不正，又是随他做，如何恁地论！”

其人又问：“南轩（张栻）谓汉后当以蜀汉年号继之，此说如何？”

朱熹说：“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汉是正统之余，如东晋，亦是正统之余也。”<sup>5</sup>

而且，他认为东晋和蜀汉并不能与东周相比，“必竟周是天子。”他以蜀汉为三国时正统所系，其理由仅仅在于刘备有继承汉朝的合法性，与东晋司马睿继承西晋的合法性完全是一样的，是“正统之余”。对曹操，朱熹以“篡”目之，比之于王莽、董卓。但曹魏之不得正统，却并非因其“篡”，而是因为曹魏并没有完成统一事业。关于朱熹的正统观，《通鉴纲目》之《凡例》表达得最清楚完整，与上述思想完全相符。《凡例》撰于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这正是隆兴北伐失败后，张栻、韩元吉提出蜀汉正统论，而朱熹曾与张栻就诸葛亮评价问题发生争论的时期。<sup>6</sup>

宁宗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通鉴纲目》仍是一部未定稿，直到嘉定十一年（1218），其书由真德秀刻于泉州。就在朱熹去世那一年，庐陵布衣萧常以蜀汉正统论的观点改写《三国志》成《续后汉书》四十二卷，进呈宁宗御览。萧常在《进续后汉书表》中以蜀汉比之东周，以《春秋》“尊王”大义为蜀汉争正统：“窃观《鲁史》之文，仰识宣尼之志。盟会所列，敢辱天子之尊；王人虽微，必叙诸侯之上。僭如吴楚，爵不过子；盛若威文，号止称侯。”<sup>7</sup>萧常的正统论仍然以统一天下的王朝为正统，而正统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则是分裂时代天下正统所系，他的观点与朱熹

<sup>1</sup> 韩元吉：《三国志论》，《南涧甲乙稿》卷17，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65册，265页。

<sup>2</sup> 朱熹：《朱子语类》卷136《历代三》，中华书局1994年，3235页。

<sup>3</sup> 张栻：《汉丞相诸葛亮武侯传跋》，《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1225-1226页。

<sup>4</sup> 赵金刚：《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18年，416-430页。

<sup>5</sup> 朱熹：《朱子语类》卷105，中华书局1999年，2636页。

<sup>6</sup> 《凡例》在其后的五十余年湮没不传。宋末，王柏得之于赵与峦，遂于度宗咸淳元年（1265）梓于稽古堂以广其传，《凡例》赖此而得存，明成化本将《凡例》录于《通鉴纲目》卷首。

<sup>7</sup> 萧常：《进续后汉书表》，《续后汉书》卷首，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4册，394页。

《通鉴纲目》更为接近。

南宋时期，蜀汉正统论逐渐与华夷之辨结合起来。历观思想史，首先把正统论和华夷之辨结合起来的，是中唐时期的皇甫湜，他写《东晋元魏正统论》，以华夷之辨反驳在唐朝占主流地位的北朝正统论，主张以“中国礼义”所在的东晋为正统。<sup>1</sup> 北宋时期，虽北有契丹，西有西夏，但士人们论述正统问题时，却并不怎么强调华夷之辨。如欧阳修不予东晋、南朝以正统，认为这一时期是正统中绝的时代。<sup>2</sup> 陈师道认为“居中国之位，有中国之民，而行中国之政矣，是犹《书》之秦，《春秋》之吴、楚，而可谓魏为狄乎？”故以北魏为正统。<sup>3</sup> 司马光与刘恕讨论南北朝帝王称谓时，甚至打算：“不然则依宋公明《纪年通谱》，以五德相承。晋亡之后，元魏继之，黜宋、齐、梁、陈、北齐、朱梁，皆如诸国，称名称卒。”<sup>4</sup> 至于南宋，胡寅在《读史管见》中把华夷之辨的原则运用于正统论，梁武帝六年“荧惑入南斗”，胡寅就梁武帝所说“虏亦应天象”发表评论：“江左帝业，虽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天象有异，皆江左王者应，故王猛语苻坚，谓江南正朔所在。”<sup>5</sup> 张栻在《经世纪年》中将华夷之辨和正统论结合起来：“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sup>6</sup>

但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却不以华夷之辨论正统，朱熹以南北朝为无统之时，并没有采用南朝的年号纪年。<sup>7</sup>《通鉴纲目》还记载了陈庆之在尔朱荣之乱中从北魏回到建康，曾对人言：“吾始以为大江之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sup>8</sup> 直到南宋亡国前后，南宋士人在引据朱熹《通鉴纲目》时，才将之有意无意地转化成以“义理”为原则的正统论，并与华夷之辨结合起来。

周密（1232-1308）曾记述南宋的蜀汉正统论以及据以重修的三国史，其中，陈过赞成朱熹主张正统“有绝有续”，但他反对朱熹“只是天下为一，诸侯朝覲，狱讼皆归，便是正统”的观点，认为“正”的原则比“统”的原则更重要：“无统而存其正，统犹以正而存也，无正而与之统，正无乃以统而泯乎？”周密非常赞赏他的观点，从以下这段充满愤激之情的言辞中，我们不难体会宋亡之后隐居起来的周密正是用“正”对抗“统”，以“理”纠正“势”：“夫徒以其统之幸得而遂畀以正，则自今以往，气数运会之参差，凡天下之暴者、巧者、侥幸者，皆可以窃取而安受之，而梟獍蛇豕豺狼，且将接迹于后世，为人类者，亦皆俯首稽首厥角，以为事之理之当然，而人道或几乎灭矣，天地将何赖以天地乎！”<sup>9</sup> 宋遗民林景熙（1242-1310）为友人胡从圣《季汉正义》写序，直接把朱熹《纲目》正统观说成是纯粹以“义理之正”为标准的正统观：“或问紫阳夫子曰：‘《通鉴纲目》主意安在？’答曰：‘主正统。’每阅其编，如书‘莽大夫’、‘魏荀攸’、‘晋处士’、‘唐特进’，笔削一字间，况老瞒汉盗，玄德汉胄，史不当黜胄而与盗，故以蜀汉系统上承建安，下接泰始，而正统于是大明。”又将“忠义之节”与“华夷之辨”结合起来，皆为“义理之正”：“正统在宇宙间，五帝三王之禅传，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广狭，势强弱，不与焉。秦山河百二，视江左一隅之晋，广狭强弱，居然不牟，然五胡不得与晋齿，秦虽系年，世无鲁连

<sup>1</sup> 皇甫湜：《东晋元魏正统论》，《皇甫持正文集》卷2，《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704册，3页。

<sup>2</sup> 欧阳修：《正统论》，《欧阳居士集》卷16，影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118-120页。

<sup>3</sup> 陈师道：《正统论》，《后山文集》卷16，“宋集珍本丛刊”第28册，线装书局2004年，787页。

<sup>4</sup> 刘恕：《通鉴问疑》，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86册，4页。

<sup>5</sup> 胡寅：《读史管见》卷13“梁武帝六年”，岳麓书社2011年，474页。

<sup>6</sup> 张栻：《经世纪年序》，《南轩集》卷14，《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747页。

<sup>7</sup> 朱熹：《朱子语类》卷105，中华书局1994年，2636页。

<sup>8</sup> 朱熹：《通鉴纲目》（第3册）卷31“梁中大通元年，魏永安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768页。

<sup>9</sup>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正闰》，《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5761页。

子，岂惟紫阳悲之！”<sup>1</sup> 郑思肖（1241-1318）在宋亡后，打算作一部《正统通鉴》，将义理化的正统论贯彻到底，“惟主于理以为权衡”，他批评朱熹《通鉴纲目》的书法不够彻底，“固得之，然犹有未尽”。作为“正统”唯一标准的“理”，就是“华夷之辨”和“顺逆之理”：“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于是。”“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诛。”<sup>2</sup>

元修《宋史·忠义传》说：“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谏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sup>3</sup>

随着儒道复兴思想运动，新兴科举士大夫阶级倡导严格的忠节观，极大地强化了宋朝士人对君主国家的忠诚。蜀汉正统论所强调的“顺逆之理”、“义利之辨”，正是忠节观大大强化的表现。“顺逆之理”、“义利之辨”与具有族裔民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结合起来赋予南宋王朝以正当性合法性，极大强化了汉族士民对南宋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正是认定南宋为唯一的中国，宋元易代就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灭亡了。宋元之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死节现象，还出现了大量的遗民，这与南宋士民的“中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学者指出，这一变化是中国古代国家观念的重要发展，是政治上的一场伦理革命。<sup>4</sup>

### 三、南宋“道统论”的政治文化功能

然而，南宋之所以能在南北对峙的历史状况下自居唯一的中国，其更深刻、更重要的理据却在于“道统”论。

韩愈《原道》中的一段话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sup>5</sup>

在这段论述里，“中国”不是由种族、地域来规定，而是被抽象成“中国之道”，就是以仁义为价值内核、以人伦礼教为人间秩序、以定居农业为基本生活方式的文明传统。“中国之道”即“先王之教”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根本原理，是辨别中华和夷狄的根本标准。而韩愈所发明的“道统”，就是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文明原理的自觉和传承。

在宋初儒道复兴运动中，从柳开、王禹偁到孙复、石介都有道统论。他们向慕三代之治，追求理想的人间秩序，他们所谓的“道”，是“立制度施教化”的“外王”之道，还不是真正道学意义上的“道”，在他们的道统谱系中，还有荀子、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等汉唐诸儒。<sup>6</sup>至于二程，道学真正成立，这意味着“道”从作为人间合理秩序的“道”、政治意义上的“道”，变

<sup>1</sup> 林景熙：《季汉正义序》，《霁山先生文集》卷3，“宋集珍本丛刊”第90册，线装书局2004年，638页。

<sup>2</sup> 郑思肖：《古今正统大论》，《心史》下卷，“宋集珍本丛刊”第90册，线装书局2004年，479页。

<sup>3</sup> 《宋史》卷446《忠义传》序，中华书局1985年，13149页。

<sup>4</sup> 参见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变化中的国家认同：对中国国家观念史的研究述评》，收入《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三联书店2008年；谢惠贤（Jennifer W. Jar）《易代之变：十三世纪中国的忠义行为》（*A Change of Dynasties: Loyalty in Thirteenth Century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山下有风：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刘晓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研究了南宋灭亡时的忠义、殉节现象及其政治、文化意涵。

<sup>5</sup> 韩愈：《原道》，影印《韩昌黎全集》卷11，中国书店1991年，171页。

<sup>6</sup> 参见熊文明：《宋初儒学道统思想研究》，河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成了作为人心内在秩序的“道”、进行道德完善精神修养的“道”、道德意义上的“道”，且“理一分殊”，外王之道必须根基于内圣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必须根基于立人之道。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提出了真正具有道学意义的“道统”论，与韩愈和宋初诸儒的道统论不同，程颐的道统之传，以宋儒上接孟子，而把汉唐诸儒摒除于道统之外。<sup>1</sup>宋以后流行的道统论是由朱熹正式提出，而在黄幹手上完成。<sup>2</sup>

朱熹《大学章句序》说：“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夫孟氏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sup>3</sup>

朱熹继承程颐的道统论，以宋儒直接上承孟子，而把汉唐诸儒摒除于道统之外。道统论的这一重大变化当然主要是因为道学之“道”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思想内涵，但同时，这种宋儒接续道统，道统在宋的话语，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朱子的道统说具有特别的政治意涵：“因为南宋与北方异族国家的冲突，南方的儒家学者滋生了民族主义的情感，强化了对宋室的忠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他们是如何从自己王朝的序列中选择具有排他性的道统竞争者。”<sup>4</sup>“治国平天下”必须建立在追求理想人格的“学”之上，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通过“学”达到理想人格，即“学为圣人”，就是实现理想政治和社会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渊曾子子思孟子相传之“道”，“道”在孟子以后就失传了，直到北宋五子才创立“道学”，使上古圣王所发现和实践的道体，从此大明于世。宋儒发明“道学”，“道统”在宋，这意味着，只有宋儒才自觉意识到并真正掌握了达到理想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原理、正确方法，也就是说，南宋虽避处江南，失去中原，但却掌握着中国文明根本的形上之理，掌握着中国文明的精神命脉。“道统”在南宋，这才是南宋之为唯一的、真正的“中国”更为根本的理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道统论所赋予南宋的“中国”意识并不导向民族主义。

黄幹《徽州朱文公祠堂记》说：“窃惟自昔圣贤之生，率五百余年而一遇，孟子既歿，千有五百余年无闻焉。考其世系，则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则又无闻焉。历世之久與地之广，其间岂无闳博俊伟之士而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

至我本朝，周程张子既相望于一时，而文公复兴于未及百年之后。周子既生于春陵，而文公复生于新安，岂非治教休明，文武周浹，天运之所开，地灵之所萃，旷古之创见而一代之极盛者欤！”<sup>5</sup>

正是在宋朝，传承道统的圣贤降生于世，而且周敦颐 and 朱熹都诞生在南宋所统治的南方而非中原，这证明了“治教休明，文武周浹”的宋朝正是“天运之所开，地灵之所萃”！道统在南宋，所以南宋得正统，这一逻辑已经呼之欲出了。

宋理宗时期，蒙古的威胁日渐严重，道统论的政治意义，那种道统在宋而宋为正统的意识，变得更加自觉和强烈了。景定二年（1261年），宋理宗立朱熹、张栻、吕祖谦和北宋五子一起从祀孔子；淳祐八年（1243），叶采写成《近思录集解》，于淳祐十二年（1252）上呈御览，他在《近思录集解序》中说：“皇宋受命，列圣传德，跨唐越汉，上接三代统纪。至天禧明道间，仁深泽厚，儒术兴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关发蒙，启千载无传之学。既而洛二程子、关中张子，纘承寓意，阐而大之。圣学湮而复明，道统绝而复续，猗与盛哉！中兴再造，崇儒务学，迺遵祖武，是以巨儒辈出，沿沂大原，考合绪论。”<sup>6</sup>

<sup>1</sup> 程颐：《明道先生墓表》，《河南程氏文集》卷11，《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640页。

<sup>2</sup>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17页。

<sup>3</sup> 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卷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sup>4</sup> 苏费翔、田浩：《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肖永明译），中华书局2018年，89页。

<sup>5</sup> 黄幹：《徽州朱文公祠堂记》，《勉斋集》卷17，《宋集珍本丛刊》第67册，线装书局2004年，728页。

<sup>6</sup> 叶采：《近思录集解序》，《近思录集解》卷首，中华书局2017年。

“道统绝而复续”不仅仅证明了宋朝接受天命，是为正统，更是赋予了宋朝在历史上“跨唐越汉，上接三代统纪”的崇高地位！

在宋理宗时期，出现了一个撰写道统传的高潮，都和王柏（1194-1275）有关，王柏是金华人，师从北山先生何基，何基学于黄幹，为朱子嫡传。他写过一篇《宋文书院赋》，就把南宋之为正统与道统南渡联系起来：“发天地之清淑，导濂洛之洋洋。自龟山之复南，开太宗之世运。”<sup>1</sup>他又写《畴依》，是一首四言古诗体的道统传，其中说：“皇宋文明，周子天畀，不由师傅，道体默契。”正是因为皇宋“文明”，所以宋儒才能于千载之后默契于道体。“恭惟道统，一绝千载，何绝之久，何续之易，师友之盛，东南洋洋，曰尹曰谢，曰游曰杨。”<sup>2</sup>道统南渡又预兆了皇宋将复兴于东南。王柏的学生车若水（？-1275）著有《道统录》，他评价说：“题目甚大，采摭甚详，愚意以为尚欠纲领也”，并为之作跋。<sup>3</sup>他在给车若水的信中，又提到蔡九峰也编写了道统传著作《至书》，与《道统录》次第一样，但不够详细；还说自己的侄子和弟子王伋也写了《道统论》，始自周敦颐而至于黄幹，“门目颇杂，皆不及此精当。”<sup>4</sup>

王伋一直生活到南宋灭亡之后，他在《江州州学四先生祠记》中明白端出：“至我朝文明启运，五星集奎，笃生英哲，绍厥统绪。濂溪元公周先生挺然特出，独造道奥，由天所授，不待师传……六飞来渡，道与之南。”<sup>5</sup>宋朝南渡，道统也随之转移南方，这就是说，道统在宋，与正统在宋是互为因果的。正是王伋，于理宗朝奏请朝廷编修国史要另立《道学传》，而当时没有施行。王柏对此大表遗憾，在给史官陈存的信中讲论《道学传》之立的重要现实政治意义：“共推国家之所以远迈汉唐者，亦以周子再开万世道学之传，伊洛诸先生义理大明，尽掩前古。今上圣德，巍煌未易形容，其有关于世道之最大者，莫如封五子列诸从祀，崇尚道学，表章四书，斥绝王安石父子之祀也。今四朝大典成于今上之朝，舍此不录，纵史笔极其典法，而五子之徒浮沉出没于列传贤否之中，便无精彩，岂不为千古之羞！”<sup>6</sup>

宋儒接续千载不传之道统，道统于宋朝重新发明于世，这使得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超过汉唐，直追三代，这在当时成为儒士之共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理宗才尊崇道学，表章四书，将朱熹和北宋五子入祀孔庙。所以，国史的撰写就应该突出道统接续于宋朝这一巨大成就，以表明宋朝超越汉唐追迹三代的正统地位。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五月，当辽、宋、金三史纂修再次启动，南人士大夫杨维桢上书朝廷，为宋朝争正统，他说：“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也。”<sup>7</sup>

杨维桢这句“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将南宋道统论的政治文化意义完全揭显出来了。

千载不传之道统接续于宋儒，彰明于宋朝，这一意识极大地强化了每一个宋朝士人对道统存续的责任意识。道统的存续，就是中国文明之命脉的存续，就是“天下”的存续，成为每一个士

<sup>1</sup> 王柏：《宋文书院赋》，《鲁斋集》卷1，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186册，3页。

<sup>2</sup> 王柏：《畴依》，《鲁斋集》卷1，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186册，7页。

<sup>3</sup> 王柏：《回赵星渚书》、《跋道统录》，《鲁斋集》卷8、卷11，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186册，125页、116页。

<sup>4</sup> 王柏：《答车玉峰》，《鲁斋集》卷7，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186册，128页。

<sup>5</sup> 王伋：《江州州学四先生祠记》，《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10，《宋集珍本丛刊》第8册，线装书局2004年，570页。

<sup>6</sup> 王柏：《复陈本斋》，《鲁斋集》卷17，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186册，251页。

<sup>7</sup> 杨维桢：《三史正统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李梦生校点，《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164页。

人都能负担也必须负担的责任，“天下”之兴亡，“中国”之存灭，有赖于每一个哪怕穷居僻壤独处一室的士人志于道学于道，成为道统的承担者——这就是道统论所产生的提升每一个南宋士人之人生的作用，也是道统论所昭示的，每一个南宋士人担当历史责任、国家命运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统论比之正统论，更加有力地强化了士人对于南宋国家的认同和忠诚。

张栻于淳熙五年（1178）在道州重建周敦颐祠堂，并写《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这篇文章清楚充分地说出了，道统论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将“中国”、“天下”的存续落实于每一位士人的人生实践，而在一开始，他就强调，宋朝之受天命、居正统与道统接续于宋儒是互为因果的：

“宋有天下，明圣相继，承平日久，元气胥会，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巨儒，磊落相望。于是时，濂溪先生实出于舂陵焉。……然世之学者，考论师友渊源，以孔孟之遗意复明于千载之下，实自先生发其端。

……盖自孔孟没，而其微言仅存于简编，更秦火之余，汉世儒者号为穷经学古，不过求于训诂章句之间，其于文义不能无时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圣贤之心郁而不彰，而又有专从事于文辞者，其去古益以远，经生、文士，自歧为二途。及夫措之当世，施于事为，则又出于功利之末，智力之所营，若无所与于书者。于是有异端者乘间而入，横流于中国。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则入于释……嗟乎！言学而莫适其序，言治而不本于学，言道德性命而流入于虚诞，吾儒之学其果如是乎哉！

……及吾先生起于远方，乃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极，中庸之诚，以极乎天地万物之变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推之于治，先王之礼乐刑政可举而行，如指诸掌。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从而得其说，推明究极之，广大精微，殆无余蕴，学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盖在此而不在于他，学可以至于圣，治不可以不本于学，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其于致知力行，具有条理，而詖谣邪遁之说皆无以自隐，可谓盛矣！”<sup>1</sup>

自秦汉以来，道统失传，儒者之求道，要么如经生那样去注释经籍；要么像文士那样去讲究文辞；经世致用者，往往靠着才智和权力，追求世俗功利；关注内在性命，进行精神修养者，又不可避免地入于道家和佛教。直到宋朝，周敦颐周子才重新找到了求道学道至于道的真正门径，向内自觉完具于心的性理，进行精神修养人格完善，哪怕穷居独处也能乐于道而立于道，所谓“学颜子之学”；在学为圣人的基础上去进行治理天下的事业，所谓“志伊尹之志”。只要诚心诚意去体悟内具于心的性理，努力进行精神修养人格完善，一个人就可以成为圣人，所谓“学可以至于圣”；只有将治国平天下的事业根基于自我人格的完善，以诚心施仁政，才是行“王道”，才可能真正实现三代之治，所谓“治之不可以不本于学”；而一个人又必须在社会之中，靠着贡献于人间合理秩序的实现，来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正是为了“志伊尹之志”，才要“学颜子之学”，这就是“道德性命不外乎日用之实”。这一“道学”是由宋儒周敦颐和二程兄弟讲明的，从此，所有的士人就有了求道学道至于道的正确途径，也有了达到理想政治和社会的正确途径。

张栻在《郴州学记》中勉励每一个普通士人在日常生活中学道明道，指出，这就是实现理想的人间秩序，进至“三代之治”的根本大道：“呜呼！今之学者苟能立志尚友，讲论问辩，而于人伦之际审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夺，则良心可识，而天理自著。驯是而进，益高益深，在家则孝弟雍睦之行兴，居乡则礼逊廉耻之俗成。一旦出而立朝，致君泽民，事业可大，则三代之风何远之有？岂不盛欤！又岂可不勉欤！”<sup>2</sup>

黄幹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也是这样告诉朱熹的同乡之士：“今公之书既家藏而人诵之矣。惟不为习俗之所迁，不为利害之所诱，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践其实，则虽

<sup>1</sup> 张栻：《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南轩先生文集》卷10，《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699页。

<sup>2</sup> 张栻：《郴州学记》，《南轩先生文集》卷10，《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682页。

越宇宙，如亲见之道之明，且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此当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无以勉之哉！”<sup>1</sup>

只要一个士人能自觉具于内心的性理，并能在日常伦理生活中加以存养、实践、扩充，中国文明之命脉就得以存续，“中国”就不会亡。也就是说，天下之存续、中国之存续，成为了每一个中国士人的责任，系于每一个中国士人之志于道学于道。我们不难体会，道统论对南宋士人的政治意识和历史责任意识，起到了怎样的激发和强化作用。沟口雄三指出，促进主体层面的强烈道德自觉是朱熹理学世界观的主旨，朱子学成为官学这件事，使得体制的承担者由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特权阶层，向地方上的普通士大夫阶层开放了。<sup>2</sup>包弼德也说，理学在最初阶段的成功，是因为它为那些有雄心但入仕机会很小的地方精英士人提供了教育、社会联系、自我肯定、地方领导权，还有以符合道德的方式生活的机会。<sup>3</sup>

#### 四、怎样认识南宋“中国”认同的历史意义？

南宋人的民族意识的确很强，南宋人大讲的华夷之辨，确实已经有民族主义的意味，但是，如果我们把华夷之辨和当时的正统论与道统论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南宋人的“中国”认同并不是近代国族意识、民族主义的萌芽所能解释。

从后见之明看，朱熹的正统论和道统论尤其重要。与一般南宋道学家不同，朱熹的正统论，承袭北宋正统论的主流，以统一天下的实际功业作为“正统”的判准——正是同样的正统观鼓动着海陵王、忽必烈发动灭宋战争，去完成统一天下的事业；他的道统论，以北宋五子上承孟子，这一在后世占主流地位的道统论，意味着宋朝虽已偏处江南，失去中原，但却掌握着中国文明根本的形上之理，掌握着中国文明的精神命脉。对于朱熹来说，南宋之所以是唯一的真正的“中国”，一是正统在南宋，南宋是正统王朝大宋的合法继承人，金朝并未一统天下，他写《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来讲明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道统在南宋，这才是南宋之为唯一的真正的“中国”更为根本的理由，他写了《伊洛渊源录》、《近思录》来讲明这一点。

当汉族政权的南宋失去中原且恢复中原无望之时，朱子将中国文明浓缩、抽象为两大精神原则即“道统”和“正统”，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原理变成了道统和正统双线，贯通天下及其历史的“道”变成了道统与正统双线，二者理一而分殊。这是中国文明在精神向度上的深化和形上化，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从此，“中国”超越了具体的种族、地域、国家，而指的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两大精神原则，“中国”成为一种具体而抽象的历史文化认同。

正如我们从朱子思想中看到的，在大讲华夷之辨的南宋人心目中，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奉行民族主义，“中国”仍然是那个使天下成为一大神圣共同体，使历史成为道之呈现的“中国”。大讲华夷之辨的南宋，它作为“中国”，它的立国原理，不可能是“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天下主义”。如果把正统论和道统论，与华夷之辨放在一起看，我们就能明白，宋代思想家并没有产生出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构建出了一套以道统、正统双线整合天下、整合中国文明的思想体系，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为新的“大一统”准备了思想条件。元朝的建立和“大一统”的再次实现，与宋朝的正统论与道统论皆有密切的关系。

<sup>1</sup> 黄幹：《徽州朱文公祠堂记》，《勉斋集》卷17，《宋集珍本丛刊》第67册，线装书局2004年，728页。

<sup>2</sup> 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三联书店2014年，49-52页。

<sup>3</sup> 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01页。

## 【论 文】

#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sup>1</sup>

周竞红<sup>2</sup>

**摘要：**国民政府初期是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的形成期，期间基本形成一套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体系，实施了一些内容庞杂、缺少系统性的政策，受到政府执政能力、行政效率和政权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都还相当有限。但是，这些管理机制的运行与政策的实施在国家实现政治整合和维护领土完整方面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面临着繁重的国家整合、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任务，在边疆民族地区外有帝国主义国家插手的分裂活动，内有基于军阀混战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而出现的社会动荡。如何选择多民族国家治理之路，有效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对国家整合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能力尚不足以全面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因而以矛盾最突出的边疆民族事务即蒙藏事务为重点，在政府中设置专门机构统筹处理蒙藏事务，其他少数民族事务并未作为边疆民族事务纳入到专门的管理系统，更多的边疆民族事务是与地方事务合二为一，边疆民族事务管理呈现一种被动、逐步扩展关注范围的状态。

## 一、一套事权分散的管理机制

初期十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在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方面基本形成了一套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从行政管理机构而言，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管理蒙藏边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但并不统筹管理全国各边疆民族事务。1927年9月，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决议案》中尚未有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设置的内容。1928年2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第七条有蒙藏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所设职能部门之一的规定。3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0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大纲》，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33次会议修正通过《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蒙藏委员会的行政地位和相关职能：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审议关于蒙藏行政事项；规划关于蒙藏之各种兴革事项。蒙藏委员会组织结构简单：委员会由5至7名委员组成，并指定1人为主席；下设秘书、蒙事、藏事三处，各得酌量分科办事，其科长、科员员额由蒙藏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核定。该组织法还规定了蒙藏委员会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每两星期至少开常会一次。需要注意的是，该组织法专门提出“本法称蒙藏者，指未曾改设行省及特别区之蒙古、西藏地方”<sup>3</sup>。显然，此处西藏是指西藏地方，不包括散居于其他省区的藏族；蒙古应指外蒙古，而非已分散于各省或特别区的内蒙古各盟部旗。可是，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蒙事则主要以内蒙古各盟旗为对象，西藏地方事务未真正纳入直接管理范围，而其他藏区事务也并未真正排除于蒙藏委员会的关注范围。由此而知，当时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事务管理的基本状态并未统筹考虑，除蒙藏地方以外的其他边疆少数

<sup>1</sup> 本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第46-56页。

<sup>2</sup>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sup>3</sup>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民族事务尚未以边疆民族事务的形式纳入政府管理视线，蒙藏委员会相关职能设计也未覆盖蒙藏以外各边疆民族事务。比如，1928年底，在热河河北、直隶永平的旗民认为旗产久为庄头把持，军阀贪官中饱，请求派员清理时，政府只是令内政部、财政部办理，与蒙藏委员会无涉<sup>1</sup>。

从蒙藏委员会委员的构成看，委员们不是地方军阀，就是蒙藏上层。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会第144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张继、白云梯、刘朴忱、罗桑囊嘉、格桑泽仁、刘继淹等七人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同时派员前往北平接收北京政府蒙藏院。7月11日，白云梯等人宣誓就职，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sup>2</sup>。12月27日，阎锡山、恩克巴图、班禅额尔德尼、李培天、诺那呼图克图等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特任阎锡山为第一任委员长<sup>3</sup>。12月31日增设赵戴文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指定为副委员会会长。该委员会于1929年2月1日正式成立，马福祥、石青阳、黄慕松、吴忠信、罗良监、许世英等先后任该委员会委员长。

蒙藏委员会的职能在十年间也有过一些细微的变化。1932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的《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扩大并细化了蒙藏委员会管理蒙藏事务的权限，变更了蒙藏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此后蒙藏委员会归属行政院领导。另外，在职能方面，此前的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只赋予蒙藏委员会“掌理和审议”有关蒙藏行政事项的职能，而对于蒙藏各项兴革事项只是“计划”，修正的组织法则直接使用了“掌理”一词，从文意上理解，蒙藏委员会直接掌理相关事项，而不仅仅限于“审议”和“计划”；修正的组织法扩大了委员会名额，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委员15至21人。这一组织法还细化了蒙藏委员会行政活动时间，并规定了与其他各院、部、会间业务上的联系，以及内部组织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规定了蒙藏委员会委员应每年轮流分往蒙藏各地视察<sup>4</sup>。同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制改为常务委员制，并将该委员会的职能定为参与制定蒙藏地区施政纲领并协助其施行；调查蒙藏地区情况，革新行政制度；兴办教育，帮助蒙藏地区实现自治等。在设立蒙藏事务最高管理机构的同时，从1932年始，国民政府将蒙藏事务行政经费也列入专门的经费预算，此后至抗战前，每年经费预算额在130万元至180万元之间<sup>5</sup>。

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十年间，蒙藏委员会共设置了九个直属机构<sup>6</sup>，指导着十几个与蒙藏事务相关的机构<sup>7</sup>。1935年，蒙藏委员会内设置调查室，并在盟旗各地派驻了调查组，负责收集、调查蒙藏各地的内部情况，按月拟制边情报告，或随时将各旗动态报告蒙藏委员会。1934年，蒙藏委员会派员分期前往青海等地进行调查，第一期派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为调查专员，率同调查员朱琮等至青海调查。同时还委任谙习汉语文的曲木藏尧，以“西南夷族考察专员”名义回故里，深入民间进行考察，并复制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分别咨送川、滇、黔、桂各省政府转发抄发住有苗夷民族之各县政府，认真调查，确实填载<sup>8</sup>。1935年蒙藏委员会增设归绥、宁夏、酒泉、西宁、西康五调查组，继续进行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1936年增设新疆、西藏两调查组。1939年后增设滇西调查组于云南丽江<sup>9</sup>。

<sup>1</sup> 参见《行政院公报》，第四号，训令。

<sup>2</sup> 参见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第八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sup>3</sup> 参见《行政院公报》第十号，府令。

<sup>4</sup>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编政治(五)，第2-4页。

<sup>5</sup> 参见《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sup>6</sup> 即1929年设置的驻北平办事处、蒙藏招待所、北平蒙藏学校(将原北平蒙藏学校更名后继续开办)，1932年设置的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1933年设置的蒙藏政治训练班，1935年设置的蒙藏月刊社、派驻边地各调查组，1936年设置的张家口牧场、杀虎口牧场。

<sup>7</sup> 1929年设置的章嘉呼图克图驻南京办事处，1932年设置的蒙古各盟旗联合驻南京办事处、西藏班禅驻南京办事处，1933年设置的西陲宣化使公署、蒙旗宣化使公署，1934年设置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5年设置的西藏班禅驻北平办事处、西藏驻南京办事处、西藏驻康办事处、西藏驻北平办事处，1936年设置的绥境蒙政会、绥蒙指导长官公署等。

<sup>8</sup> 参见(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代号：一四一，档案号：97。

<sup>9</sup> 此后，这些调查组的名称或调查区域也有所变化。

在国民政府的行政系统中，一些专业部、会在日常行政中也常涉及边疆民族地区事务，各部、会遇有与蒙藏相关问题一般会咨询蒙藏委员会，或将有关情报及承办事项送交蒙藏委员会参考，或由蒙藏委员会协助办理，有的则设立了专门处理蒙藏事务的机构。专业部、会遇有蒙藏重大事项的决策时，常常是蒙藏委员会与相关部、会会商决策，由行政院或国民党中央批准。如内政部在蒙藏地区的行政规划或有其他行政行为时需要与蒙藏委员会会商决策，呈行政院批准施行。

1929年8月，行政院通过教育部提请设立蒙藏司，1930年3月，蒙藏教育司正式成立。从教育部组织法可知，此司设二科，第一科掌理关于蒙古地方教育调查、地方各种教育之兴办、蒙古教育经费之计划、蒙古教育师资之培养、蒙古子弟入学升学之奖励、编译蒙文教育图书及法令、蒙古地方学术考查及其发明之奖励等事项，第二科专门掌理关于藏族教育的相关事项。在国民政府初期十年中，教育部蒙藏司为推动蒙古教育发展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先后制定颁布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教育部实施蒙藏教育计划》、《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等法规和计划》等，并为实施这些法规和计划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sup>1</sup>。

国民党在民族地区建立的党务组织机构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也逐步增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是掌理各级党部组织与党员训练、指导党员参加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的中央机构，设有边疆党务处负责处理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党务的专门机构。在国民政府初期十年中，国民党由于本身党员数量有限，大多数民族地区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其在民族地区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比如在新疆、西藏和西南一些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组织几乎不能涉足。在内蒙古、东北等地国民党组织有所发展，早在1927年国民党中央就决议派员指导内蒙古地区的党务工作，并予以一定的经济支持。边疆党务处负责向各蒙旗派遣党务特派员，蒙籍国民党党员也由此处管理。

边防体系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主要支撑。国民党执政后强化了军队建设，不仅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中央军，还不断采取措施强化对地方武装力量的控制，建立了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的中央军与地方武装结合的国防体系。为了巩固和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国民政府在军事管理部门中设置相关机构，国防部、军令部（二厅五处）和参谋本部均设有专管边疆事务的机构或特别派驻蒙旗的军事专员。其中参谋本部<sup>2</sup>的边务组是蒋介石担任参谋本部总长时设置的，先后由次长贺耀组、黄慕松负责，边务组专门搜集蒙藏情报动态，调查蒙藏情况，研究边疆问题，有时还执行一些具体任务，如1933年百灵庙运动发生后，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前往巡视，边务组成员为其随员；黄慕松则多次奉蒋介石之命到边疆地区巡察，并于1934年代表中央政府入藏致祭达赖喇嘛。军事委员会的铨叙厅主管边疆武职人员的审核、转呈、授衔等事宜。

边疆民族地区开发建设事项则主要由专业部、会负责，或各部、会联合会商。如海南岛开发问题的决策过程就是由商会组织以条陈或提案的形式提出，相关条陈由广东省财政厅或径自函送全国经济委员会，行政院组织军事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内政部、军政部致函行政院提出会拟此问题。全国经济委员会指出：“以据军政部次长陈诚电陈，琼崖关系两广及国防甚巨，有设特区必要。”从议事过程来看，在会上，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报告了召集内政、外交、实业、交通、军政五部开会的情况，财政部报告了琼崖财政情形，内政部报告了民国二十一年海南岛设特区之经过。随着问题讨论的深入，实业部、交通部和铁道部都提出了相关计划<sup>3</sup>。

一些地方政府则设置了地方性的边疆民族事务机构，并对区域性边疆民族事务管理起到了实际作用。比如，1927年，刘文辉接管西康后，在成都二十四军军部设置了边务处，任命胡子昂为处长，并任用一些熟悉边情的学者和政治家在处内供职，边务处遂成为二十四军辖区内各边

<sup>1</sup>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sup>2</sup> 1938年，参谋本部合并于军令部

<sup>3</sup> 参见夏军编选：《民国时期计划开发海南岛的一组史料》，《民国档案》1992年第29期。

远县区施政规划和领导机构<sup>1</sup>。1929年11月，云南省政府报请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在边疆地区成立了两个殖边督办公署，职责为防守、界务、实边、交通、实业、文教、治安、慈善、卫生及省政府委办诸事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政务委员会设有蒙旗处，负责处理内蒙古东部的盟旗事务；绥远省则在政府秘书处内设一蒙务组，处理乌、伊两盟的蒙旗事务。1936年为了控制、监督蒙政会而设立的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亦是一个重要的边政机构。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在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方面初步形成的是一套事权分散的管理机制，管理活动缺少统筹性和系统性，作为专门管理蒙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管理能力极为有限，而其他专业部、会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分业管理，各部门之间的会商常常成为文牍旅行，会商之事常常会而不决，当时很多计划都成为纸上谈兵。这一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管理机制根本无法保障国民党在其党义中宣扬的“扶持弱小民族”的政治承诺。

## 二、以部门化为特点，内容庞杂、缺少系统化的边疆民族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在初期十年对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政策是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逐步展开的，内容十分庞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部门化为核心特点，很多政策的制定并非源于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统筹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急措施。

### （一）划一边疆民族地方行政建置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划一边疆民族地区地方行政是国民政府强化其统治，推进政治整合的重要步骤，涉及省、县、乡等多个层级，热、察、绥、宁夏、青海、西康等建省和西南、西北一些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进一步废除都在此时期实施。

1928年7月，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提议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改为行省。后经内政部正式提出改省建议。8月底，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设立省治。依据内政部最后拟订改省方案，1928年9月5日国民政府第153次会议议决：热、察、绥、青海、西康改省治；旧直隶省口北道各县划归察哈尔，察哈尔原划绥远之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四县仍归绥远；五省府组织，委员暂定五名，设民政、财政二厅，并酌设教育、建设厅，余照省府组织法办理。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甘肃分治，设立宁夏、青海二省。

热、察、绥的改省和甘肃分治设立宁夏、青海省均得以顺利推行，西康建省之路则最为曲折。国民政府宣布西康建省时，该地由川康边防总指挥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接管。民国十七年（1928）春，刘文辉见各边区的军事、财务机构已设置齐全，遂根据边务处的建议和推荐，在康定设置了一个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作为西康最高行政机关，任命龙守贤、吴三泽、程仲梁、陈启图等五人为委员，并指定龙守贤为主席委员。5月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sup>2</sup>，建省委员会由此而未能成立。直到1934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简派刘文辉等为建省委员会委员，1935年7月21日建省委员会才在雅安正式成立，负责筹备建省事宜，执行公务。但是，直到1939年迫于国内外形势西康才正式成立省府。

为了进一步向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延伸其统治，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地方行政变革，推行县制与一些地区废除土司制度相伴随。云南在1929年至1936年期间频繁规范地方设置，据不完全统计，设置县或设治局等就有30余处。广西、四川等地也经历了这一过程。1929年四川省政府呈请将穆坪土司改设为宝兴县治，得到行政院批准备案。广西都安县是一个民初才废除土司建立的县，为了强化管理，此时改开县政，1931年建立区、乡、村政权，推行保甲制

<sup>1</sup> 参见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康史拾遗》，甘孜州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印刷，第90页。

<sup>2</sup> 参见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康史拾遗》，第66页。

度，全县划分安定、高阳、都兴、夷江 4 个区和 32 个乡镇。<sup>1</sup>

1931 年 8 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明令撤消土司一案”，决定“嗣后土司不予补官袭职，以便逐渐改流”。但是，国民政府只是宣布了土司制度的不合法性，由于其统治能力所限，一些土司、千户隶属体制实际并未被打破，如青海蒙古族和藏族牧区，实行以县制代替王公盟旗制度和千户制度，蒙古各旗分归都兰、兴海、海晏等县管辖，藏族地区由玉树、囊谦、称多等县统理，可是到 1949 年，这里仍有千户 1 员，直属百户部落 7 个，领属百户部落 36 个，该地区的寺院还分别属千户、百户、百长所有<sup>2</sup>。青海蒙藏地区实行县和保甲制度后，这些千户、百户、百长们又成为副县长、区长和保长、甲长。<sup>3</sup>可见，国民政府在其政治势力还不能达到边疆地区时，采取的措施是将各边疆民族地区统治集团全体留用，改名换姓，服务于其统治。

## （二）移民实边，巩固边防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移民实边以固国防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的传统之策，国民政府初期实施该政策不过是 对历史传统的一种继承。时人认为“东北与西北及西南之开发，关系中国全民族之生存，他国侵略之野心与事实尤令人惊心怵目，设不急起直追，势必任人宰割。年来，东北发展卓著成绩，然未辟之土地、未开之矿业与天然富源正无限量；西北开发，以交通为先务之急，自苏俄环绕新疆境外铁路完成及其与西伯利亚铁路接轨以后，对华侵略势成常山之蛇，西北形势更属危急，屯垦事业应即举办；西南亦有外人窥伺，而且天然富源久付旷废，亦应积极开发”<sup>4</sup>。

1931 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生计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案》，提出边地开发屯垦与移民实边及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针，要求“必须订立之案，积极进行；并予以财政及其他必要之援助。而对边地土著人民生计之筹划，尤为紧要。故开发边地，必须特别注重边地土著人民之生计”<sup>5</sup>。并将此点定为国民生计建设五方针之一。此次大会还通过了《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切实进行案》。同年全国内政会议通过《移民实边案》，提出向人口稀少的吉、黑、辽及新疆、蒙古、青海等地区移民。这些决议对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1935 年内政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地政会议，青海、宁夏、云南等边疆省区均提出了移民垦殖案。1936 年 3 月，内政部等部、会联合向行政院呈交《边疆移垦办法大纲草案》。一时间，垦务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统治者获利的重要手段，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农业开发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三）蒙藏委员会主导的争取蒙藏上层支持的各项政策

对边疆民族上层的笼络和宗教事务的管理是蒙藏委员会的核心工作。1933 年行政院所 颁《中央及地方主管机关对于处理蒙古盟旗事项权限划分办法》明确规定：“蒙藏委员会除依照本会组织法掌理关于蒙古行政及各种兴革事项外，前清理藩部则例所载关于蒙古各盟旗设官、奖惩、铨恤、军政、司法、宗教等事项，历来照例办理者，亦均系蒙藏委员会对于盟旗直接主管之范围，此后遇有此种案件，应仍照向例，由蒙藏委员会呈请行政院核办”<sup>6</sup>。依此规定，加之国民政府实际执政能力的限制，蒙藏委员会实际具有的职能便是办理封官、颁号等能够笼络蒙藏上层的事务。

1932 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三届第三次中央全会，班禅、章嘉两位大师以代表身份参加大会，班禅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在南京设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从 1932 年起，国民政府每年从国库拨出 48 万余元来支付班禅年俸及“办公费”<sup>7</sup>。1932 年 4 月，国民政府明令加封章嘉呼图克

<sup>1</sup> 参见《都安瑶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 页。

<sup>2</sup> 参见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9 页。

<sup>3</sup> 参见陈新海：《民国时期青海管理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7 年第 3 期。

<sup>4</sup>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 179 页。

<sup>5</sup> 荣孟源等：《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 页。

<sup>6</sup> 《国民政府政治制度档案资料选编》（下），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41 页。

<sup>7</sup> 参见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7

图“净觉辅教”名号，章嘉呼图克图还加入了国民党，并于1935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据统计，蒙藏委员会的经费开支每年都在100万元以上，其中大部分用于支付活佛、王公和其他上层的年俸或活动经费，蒙藏委员会剩下的经费又有一部分用于招待蒙藏上层及旅费、赠送礼品等项开支<sup>1</sup>。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追封其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颁给玉册、玉印，并派专使入藏致祭，拨给西藏地方政府治丧费5万元，专使还按旧规旧制给三大寺及其他大寺庙的喇嘛熬茶、放布施，给三大寺每一喇嘛大洋2元。据称专使入藏经费共用大洋40万元<sup>2</sup>。

1933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次中央全会通过了《蔡元培等四委员介绍西康诺那呼图克图提请对蒙古王公名号暂仍其旧案》。此外，“除了任命内蒙古各盟长、总管等为有关各省省政府委员外，国民党还给有势力的王公扎萨克以种种好处，从给钱、给枪，到拉他们入党，授以各种司令、宣抚使等名义，直到委以国民政府委员要职”。同时，将“扎萨克由世袭改为‘任命’，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时兴的字眼，实质一点儿没变……各盟旗扎萨克纷纷‘举荐’子弟接任，不到半年时间就连续任命发表了10余旗新扎萨克，其中无一人为原扎萨克以外之人。此后，王公扎萨克子孙世袭一仍旧贯，爵位名号仍自为之”<sup>3</sup>。

实际上，在蒙藏地方建设上，蒙藏委员会也有一定的规划，但是这些规划大多徒有虚名，蒙藏委员会最多不过是对内蒙古有些盟旗发放一些救济金。如1936年蒙藏委员会呈准发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建设费，同年分别发给阿拉善、额济纳西旗、青海左右翼两盟建设费，并每月发给补助费3000元，以期推动这些地区的开发建设<sup>4</sup>。但是，这些政策行政力度弱，覆盖面小，影响十分有限。

#### （四）以民族同化为宗旨的边疆民族教育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在全国建立一套完整的初级、中级和高等学校教育制度，受到这一大背景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些发展主要表现为：

1.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规划提到日程，教育部门逐步从只关注蒙藏教育扩展到其他边疆民族地区。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教育最初规划的只限于蒙藏教育，1931年颁布《实施蒙藏教育计划》明确规定蒙藏地区教育行政、普通教育实施办法、高等教育实施办法等，使蒙藏地区教育发展目标明确化。从这个计划来看，普通教育仍然依托边疆民族地区办理，而高等教育则主要依靠边疆民族地区学生到内地求学，所以，此项计划还规定新疆学生适用专对蒙藏的相关学生待遇法规。

1936年7月，教育部发布《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指令》，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关注的范围已由蒙藏发展到西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这项计划重点在于师资培训，涉及的省份包括新疆、宁夏、青海、甘肃、绥远、察哈尔、云南、贵州、湖南、西康、西藏，可见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管理范围的扩展。该计划对小学、社会教育、中等教育、留学生等都有所涉及，还对办理相关教育的经费做出了详细规定<sup>5</sup>。

这些计划虽然未能得到全面执行，但是从一些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来看，还是有过重要的影响。而对于相当多的边疆民族地区言，建立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仍属社会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2. 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有所增加。国民政府初期十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额度有稳定增加，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如1930年中央预算教育经费1440万余元，仅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1.46%；到1935年中央预算教育经费增至4913万余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4.8%，成为民国成立以来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比例最高的一年。按1930年至1936年有比例数据可考的五年折

页

<sup>1</sup> 参见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第237页。

<sup>2</sup> 参见唐景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措施》，《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

<sup>3</sup> 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第236页。

<sup>4</sup>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一四一，档案号：392。

<sup>5</sup>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82页。

算（1933年和1934年缺国家总预算数），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的比例平均每年可达3.54%<sup>1</sup>。经费逐年增加是促进各级教育向规范和规模方向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条件。这一时期教育发展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边疆民族地区教育投入同样也有所增加，蒙藏教育获得了专项费用，1933年6月2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据蒙藏教育委员会呈请经第147次会议决定，先拨1931年度蒙藏教育经费50万元，并将50万元列入1934年度预算。

1935年，边疆教育作为独立的经费项目被列入预算。据统计，1935年边教费支出情况为：贵州总计得教育费16万元，其中义务教育费8万元，边教费8万元（其中苗师3万元）；云南总计得教育费17万元，其中义务教育8万元，边教费9万元；甘肃得教育费16万元；西康6万元；青海8万元；宁夏7万元；绥远8万元；新疆8万元；察哈尔8万元；西藏无。第二年，除青海、西康、宁夏经费未增加外，其他各省增加1万-7万元不等，并且分配给西藏1.8万元。1937年，四川、湖南、西康三省各得边教费3万元，广西、西藏为2万元，云南、贵州、新疆5万元，甘、宁、青、绥远各4万元，察哈尔2.5万元<sup>2</sup>。至1936年，边疆教育经费计为41万余元<sup>3</sup>。一些地方性教育是靠中央拨款发展起来的。如1931年青海利用蒙藏委员会的“边疆教育专款”成立了青海蒙藏文化促进会，并先后在各县和牧区办起蒙藏小学10所，后均转交所在县区管理<sup>4</sup>。1935年教育部拨专款在皋兰、海原、固原、清水等地先后办起7所回民小学。同年，甘肃省教育厅也利用中央教育补助费筹设回藏小学10所<sup>5</sup>。从1935年起，民国政府在云南省藏族聚居的中甸、维西、德钦等地创设3所省立小学，即德钦小学、中甸小学和维西小学<sup>6</sup>。

边疆省区教育经费在初期有一定程度增加。如察哈尔省，1930年度教育经费共计266,901元，此后直到1933年度均保持此额度，1934年增加到293,447元；宁夏省1931年度教育经费只有45,816元，但是两年后增加到183,498元；云南省1930年度教育经费只有259,615元，此后除1933年度为587,800元外，直至1934年度均未低于702,000元；甘肃省1931年度教育经费为259,272元，此后至1934年底均未低于1,249,687元；与其他省份相较，青海省教育经费额度较低，1930年度只有76,900元，虽然逐年增加，至1934年度也只有96,343元<sup>7</sup>。但是，欠发教育经费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实际情况，由于欠发情况严重，以至于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开发土地以清理积欠教育费，据他称，教育部调查历年所欠教育经费约为367.7万元，其他由财政部及各省拨发者当不过200余万元<sup>8</sup>。因此不可过高估计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教育发展的投入，不过已有的投入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起到了开拓性影响。

3. 在内地一些大学设立蒙藏班，招收蒙藏学生。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计划附设蒙藏班，名额为60人，分为甲、乙两组，甲组学制二年，乙组学制三年，毕业后回边疆地区工作，亦可考国内各大学或专门学校。同时还设立西康学生训练班，这是针对西康所设的短期训练班，为期四个月。1934年，计划设立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分校，先在张家口、包头、宁夏、康定、丽江、兰州、伊犁八处各筹设一年分校。当时规划，分校第一年先办简易师范单轨一级，及小学初级复式一级，以后逐年增加，必要时可改办双轨；每学级人数，简易师范以50人为限，小学以40人为限<sup>9</sup>。据1935年编印的蒙藏学校总名录可知，当时包头、西宁、康定等地蒙藏学校共有蒙、藏、回学生268名。蒙藏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显示从1929年至1933年，共保送入内地各校的蒙、

<sup>1</sup> 参见张元隆：《民国教育经费制度述论》，《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

<sup>2</sup>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91-890页。

<sup>3</sup>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89页。

<sup>4</sup> 参见陈新海：《民国时期青海管理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sup>5</sup> 参见杨荣：《民国时期甘肃民族教育述略》，《西北史地》1996年第1期。

<sup>6</sup> 参见苏发祥：《民国时期藏区教育概述》，《民族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

<sup>7</sup>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115-116页。

<sup>8</sup>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二(2)，档案号：33上。

<sup>9</sup>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教育，第817页。

藏学生达 256 人<sup>1</sup>。

从 1931 年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来看，蒙、藏、新疆学生待遇基本一致，高等教育招生中蒙、藏、回<sup>2</sup>族学生待遇也大致相同。该原则还规定：“在八年内分年资送蒙藏学生出洋留学”，“选派区域及额数内蒙十名，外蒙八名，青海二名，西藏八名，新疆四名，共计三十二名”。学生受教育程度为高级中学以上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留学年限为 3-7 年（学医及学工程的酌量延长），选派期限为每两年考选 9 名，赴日本 4 名，赴欧美 5 名。教育部制定选送及考选规则。教育部限令 1931 年秋中央大学、北平大学成立蒙藏班，同年国立中央大学也颁布了招生办法和名额，学生总额为 40 人，蒙、藏各 20 人<sup>3</sup>。

1933 年，宁夏省提出适用《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的要求。此前国立浙江大学每年收 1 名该省所送学生，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收 3 名该省所送学生，国立北洋工学院收 2 名该省所送学生。在此基础上，宁夏提出要求国内各公私立著名大学或专门学校每年招收宁夏免试入学学生 1-3 名，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1936 年 10 月，蒙藏委员会根据西南夷文化促进会南京总会呈请致函教育部，要求比照《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对苗夷学生实行优惠政策<sup>4</sup>。

随着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少量少数民族文字与汉文字合璧的课本或其他出版物得以出版。据 1931 年蒙藏委员会《蒙藏事务总报告》称：蒙藏地区 30 余个旗宗中，有中小学 130 余所，学生约 7000 余名，历来共译汉藏文合璧语文教科书 8 种，汉蒙文合璧短期小学课本 1 种，汉回文合璧短期小学课本 1 种，1931 年历书 1 种，以及蒙藏教育等实施方案十数种。尽管国民政府增加了投入，强化了规划，但是由于投入量有限，还不能从实质上推进各边疆民族教育的全面发展，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仍然十分落后。以宁夏为例，据统计，到 1940 年，全省拥有国内专门以上学校毕业生仅为 34 人，肄业 47 人；中等学校仅有 4 所，学生共 619 人；普通小学、短期小学共 482 所，学生共 34924 人，小学教师合格代用者共 811 人；失学儿童 69771 人，占学龄儿童 71% 以上；失学民众 48 万余人，占全省民众 95% 以上<sup>5</sup>。

#### （五）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开发建设政策

1928 年 1 月，国民政府成立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1932 年称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 年改为资源委员会），调查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建设边疆民族地区是两个委员会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开发的计划和边疆民族地区的资源调查。1931 年完成了云、贵、川、西康等省的地质调查，对察哈尔、甘肃、宁夏等省的调查仍在继续，同时拟在边疆地区多觅铁矿、铜矿与石油矿，分别保留或划作国营区，择其最佳者，由国家经营，以充实国防原料；开始筹办开发陕甘川新石油，已在陕、川划定国营区。<sup>6</sup>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丧失，国民政府更加注重西北边疆开发，并强调要以西北为复兴基地，提出各种开发西北的系列计划和决议案。1933 年，在国民党四届三次中央全会上有 60 项提案，其中有 8 项与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开发相关。西北边疆地区开发成为重点后，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守中曾于 1932 年、1934 年先后两次奉命赴西北调查实业，得出的结论是“应以边防为经，实业为纬”，提出“充实边防，经营交通，振兴农村，改良畜牧，开采矿产，提倡工业，减轻民众负担，维护地方治安，培养边务人才，推进蒙旗教育”等 10 大要务。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建设做出一些重要的规划，如 1931 年 5 月，建设委员会拟订了内容浩繁的《开发西北计划》，开发计划涉及交通、水利等很多方面<sup>7</sup>。

<sup>1</sup>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一四一，档案号：97。

<sup>2</sup> 此处“回”实际指新疆维吾尔族。

<sup>3</sup>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 833 页。

<sup>4</sup>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 864 页。

<sup>5</sup> 参见胡平生：《民国时期的宁夏省》，学生书局印行 1988 年版，第 383 页。

<sup>6</sup>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第 178 页。

<sup>7</sup> 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 年第 2 期。

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计划分公路、水利、卫生、农村建设四部分。从取得的实效来看，开发建设除了特定地区金矿等矿产开发外，还集中于公路、铁路和邮路等方面。全国经济委员会从1934年3月筹款直接兴筑西兰公路，至1935年5月竣工，土路通车，共计耗资93万余元<sup>1</sup>。1934年至1936年期间，国民政府在西北修筑的土路、省际联络公路等10多条，总里程达到9200多公里<sup>2</sup>，对这一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产生了重要影响，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邮务也是国民政府加强与边疆民族地区联系和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据1936年统计，自1933年，边疆民族地区的邮政条件有所改善，当时滇康邮路总长为1130里，甘孜经德格至玉树线长1000里，玉树至湟源线长1380里，巴安经白玉至德格线为900里，在西康还设各级局所近20处，一些村镇设置了信柜。与此同时，四川、云南、贵州三省邮务之联络有所增强，1935年以后开设局所及信柜21处，邮路约1200余公里<sup>3</sup>。

铁道部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铁道建设，而且有着自己的建设计划，其计划中的陇海线潼宝段1936年已完工，与西南边疆相关的铁路建设计划主要有成渝线（施工期2年半，计划于1937-1938年间完成）、黔滇线（施工期4年，计划于1947-1950年完成）、川黔线（施工期4年，计划于1947-1950年完成）。但是，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些计划逐步落空。

### 三、结论

国民政府初期十年奠定了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和政策系统，蒙藏委员会是中央政府专门管理蒙藏问题的机构，而军务、党务机关是强化军事力量和国民党对边疆民族地区影响的机构，涉及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经济建设内容则分别由各专业部、会来管理，至于地方政府则是管理区域性边疆民族的重要依托。在一个地域广大的多民族国家，一个事权分散、缺少统筹管理边疆民族事务机制的政府，很难满足国家整合、民族团结的管理需求。事权分散和缺少统筹，使得管理本身“事权分属，政令分歧，使边民无所适从，浸假失其敬信”，加之“人才不足，各有其计划，各种施政不能配合，步调不能一致，此出彼入”，<sup>4</sup>加深了机制缺失的负面影响。从国民政府初期十年的政策内容和目标来看，为推进社会政治整合而实行的政策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实施力度也相对较大，但是缺少持续性和统筹性，其以推进民族同化为旨归的教育政策相对来说更为规范，显示出逐年推进的特点，至于经济开发建设政策不仅政策投入量小，执行力度也十分有限，特别是一些开发项目常常成为官僚机构掠夺各民族群众财富的合法性来源，对政治整合不仅未产生应有的正面影响，反而引发了人民群众的抗争。总体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仍然处在初步形成阶段，受到军阀争斗、行政经费、行政经验以及行政效能甚至国际关系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政府统筹不力，难以满足中央政府建立党治的需要，更不可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些机构功能的发挥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仍然起到了一定历史作用。

---

<sup>1</sup> 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sup>2</sup> 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sup>3</sup>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九)，第600-601页。

<sup>4</sup> 黄奋生：《边疆政教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2-33页。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62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